

我國政策學習對象選擇機制之探討

李仲彬*

- 壹、前言
- 貳、文獻回顧
- 參、研究方法
- 肆、研究發現
- 伍、結論

遭遇政策困境時，透過向外學習以產生自身方案的雛型，已是政策實務常見的作法。然而，政策學習要能成功，教材（lessons）/資訊的品質及適合度至關重要，學習前若能慎選學習對象，較能事半功倍。可惜的是，現有文獻對於選擇政策學習對象之機制為何？政府如何挑選學習對象？背後有無什麼認識論策略？並沒有系統性討論。

依此，本文初探我國政策學習現況，先回顧和政策學習對象選擇有關的文獻，納入我國地緣特徵因素後，整合歸納提出分類架構，再以行政院部會的資料進行內容分析，描述我國政策學習對象的來源分布，並推論背後的可能機制，與前述架構對話。結果發現，我國的學習對象選擇機制具有制度主義解釋的特徵，與組織現有網絡、認知限制與習慣有關，受非因政策學習目的而建

*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E-mail: cplee@gm.ntpu.edu.tw

投稿日期：2024年8月27日；接受刊登日期：2025年2月5日。

東吳政治學報/2024/第四十二卷第二期/頁 65-139。

立的關係（例如外交關係）影響，會考量習慣與便利而選擇容易取得資訊的地區（例如交通、語言易及），且因過往歷史而受霸權、區域主義牽引，幾乎所有政策領域都相同。

雖然本文無法評斷現有政策學習資訊的品質是「好」或「壞」、多樣性是否足夠，但在實務上，仍建議將資訊評估工作制度化，導入到機關中。研究上則針對政策學習所倚賴之資訊網絡的變遷，進行跨時分析，並深探地緣特徵因素所產生之影響。

關鍵詞：政策學習、經驗汲取、資訊網絡、政府資訊行為

壹、前言

...學習是一個包括資訊尋求 (*information seeking*)、採用、和政策改變 (*policy change*) 三個階段的過程，其中資訊尋求的部分是學習過程的基礎步驟 (*foundation step*) ...

Lee & van de Meene (2012, p. 199)

一、背景

在政策發展過程中，許多狀況都會驅使政策推動者進行對外尋求政策參考資訊的動作，例如遭遇從未經歷過或棘手的問題而需要尋找解方時，政策制定者透過向其他地區的學習／參考國外經驗的方式來減低自身政策錯誤的風險，就是一個很常見的情形 (Freeman, 2007; Radaelli, 2004)，稱為「跨國政策學習」(cross-national policy learning) 或經驗汲取 (lesson-drawing)。對一個政策學習者而言，在觀摩學習對象的經驗後 (不論是成功或失敗的經驗資訊)，有時會刺激出解決自身政府問題的方案，有時會直接複製被學習者的作法以減低自身試驗新政策的失敗風險，促成創新擴散 (innovation diffusion) 現象，有時會啟發出本身既有政策設計的修正，或者，有時會利用這些資訊進行所謂政策導向學習 (policy-oriented learning)，也就是依這些從外獲得的資訊或證據，來強化或調整自身政策信念 (beliefs) 及立場，進行政策倡導 (policy advocacy)，加強政策的穩定性或觸發政策變遷 (Weible et al., 2023)，當然也有可能對這些資訊不做任何應用。總之，不論是上述哪一種「政策學習」，一剛開始都有一個引入學習對象之資訊或經驗的行為，就像我們常聽到的一句話：「人就是要多聽、多看、多學」，對政策制定者而言也是如

此，這些引入的政策資訊是很重要的決策依據，也是政策是否變遷的「訊號（signals）」（Jones & Baumgartner, 2012）。

只是，在學習資源有限、時間有限、人力有限的現實環境當中，一個必須對外學習的政府，不可能使用全境掃描、完全理性的方式來引入資訊，通常只會在有限範圍內搜尋，也就是 Mossberger（2000, p. 26）所稱的「有限搜尋」（bounded search）。不論是政策倡導聯盟（Policy Advocacy Coalition）裡面的倡導者（Luxon, 2017），或是擴散過程中的學習者（Rogers, 1995），都是認知有限的。那麼，在這個「有限」下，政策學習資訊是怎麼蒐集的？資訊取得範圍受限在哪些對象？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是某個程度的理性判斷，還是會受制度牽引？是不是真如 Shipan 與 Volden（2012）的發現，政府對學習資訊的選擇，其實與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y）有關，而不是考量政策學習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取得學習資訊的過程，時常受到主觀偏見引導，而不是理性評估。

學界對於上述問題之回答是不足的，實務上也常見到媒體批判政策學習學錯對象，這些問題其實都是政策學習過程一開始時「資訊處理過程（information processing）」¹ 的問題。政策學習研究領域裡面，很少有人系統性地分析決策者的資訊處理過程（Nowlin, 2021, p. 1035）。例如，研究政策擴散議題的政治學者，大多僅聚焦在地理鄰近者對擴散的影響，而忽略了資訊可用性（information availability）及網絡（network）² 的角色，因此，Berry（2023）呼籲未來的研究必須更關注在資訊網絡議題上，例如決策者個人網絡多樣性、社會網

-
1. 所謂政策資訊的處理，指的就是政策變遷之前，蒐集、組合、解釋、排序來自政策環境中的各種訊號的過程（Jones & Baumgartner, 2012）。
 2. 這邊指的「網絡」，指的是潛在的學習者與被學習者的組合。一般來說，學習者的學習資訊來源，都是從網絡當中其他的人（或組織）取得。

絡結構、專業者協會網絡...等在政策擴散環境中的角色，尤其是在數位科技發展的情形下，政府人員間分享資訊的方式可能因此改變，資訊網絡如何變化更是重要。在政策倡導聯盟的研究中也有一樣的缺口，例如，實際上只有「有限理性」的倡導者，沒有能力監控所有政策資訊，究竟他們是如何蒐集、解釋和整合政策倡導所需的資訊？是根據哪些資訊進行後續的行動？也是目前很少被研究討論的範圍（Luxon, 2017, p. 109）。

二、研究目的、問題與重要性

「政策學習」相關主題很廣，對政策學習的定義也很多元，但不管哪一種定義，彼此的一個共通點認為政策學習是政府的一種行動，一種讓政府「知道的更多、擁有更多有用資訊」的行動，而這些「資訊」，也就是 Rose（1993）所稱的經驗教材（lessons），有多種可能來源，可能是自身，可能是外界，可能是現在，或過去。此外，獲得這些資訊之後，政府也有許多不同的回應方式（或甚至不回應），換言之，政策學習是一個複雜的資訊獲取與應用的過程。本文在有限的資源與篇幅限制下，無力回答 Nowlin（2021）或 Jones 與 Baumgartner（2012）認為政策學習應包含「資訊處理過程」的所有議題，這將包含了資訊蒐集、資訊篩選、新資訊使用的排序與重要性權重...等，範圍實在很大。

本文對「政策學習」的定義為政府機關在政策過程中，透過各種方式讓自己知道的更多、擁有更多有用參考資訊，並最終利用這些資訊在自身政策決策過程與品質的改善工作上³。至於獲取上述資訊

3. 在實務上，政府機關獲取更多資訊之後，也有可能對該資訊視為不見，不僅沒有做任何政策處置，連認知層次的（cognitive level）改變都沒有（也就是「不回應」、沒有政策變遷），但此情況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當中，因為本文後續實證部分所編碼的政策學習，指在政府

(亦即「經驗教材」)的來源，雖然文獻上曾經提到許多可能性，包含自身、外界、現在或過去(詳細討論請見文獻回顧一節)，但本文在有限的資源下，為了能夠聚焦，將僅先討論獲取自「外界」(尤指其他國家)的資訊上，換句話說，本文所指的政策學習「對象」，指的是取得政策學習資訊(經驗教材)的來源「國家」。聚焦在國外的原因，除了因為測量的可行性之外，也是呼應 Stone (1999, p. 51) 所說，政策學習是「...和政策、行政配置或制度設計有關的一些知識，跨越時間或空間被其他地方所使用的一個機制...」，而在「...全球化的時代下...這樣的現象正在增加...」。

過去政策學習領域的研究，大致被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是針對單一政策學習事件進行「某一學習者 vs. 某一被學習者」兩者間互動方式的研究(例如交流方式、溝通方式)，或是學習者自身內部對單一政策採用過程的研究(通常被稱為「過程研究(process study)」)，例如黃東益(2004)、傅岳邦(2017)、柯于璋(2016)、彭俊亨等人(2010)、孟繁勳等人(2020)...等，都是屬於這一類。另一類則是以單一政策為焦點，探索社會環境中所有潛在學習者的學習意願或程度(稱為「擴散研究(diffusion study)」)，例如李仲彬(2010, 2013)、廖興中(2020)...等，是屬於這一類。可惜的是，不論上述哪一類，針對本文關心的議題，也就是學習者在進行對外資訊搜尋時，習慣往哪裡搜尋？向誰搜尋？這些被搜尋者共通的特徵為何？資訊來源的選擇考量有哪些？...等問題，迄今幾乎沒有文獻投入(李仲彬, 2021)，更遑論不同政策領域的比較，而這是本研究將填補的空缺。本文的重要性，就實務上，可以回應以往一些政策學習事件為

文書中有聲明指出，我國政府機關至少有認知到該資訊對我國未來政策的意義，或甚至依該資訊做了明確的政策改變或創新。

外界所詬病的現象，例如：

.....【...看到外國的就想抄】...臺灣...有一種現象，那就是過一陣子就會冒出一些名堂，說是從國外引進...世界的潮流...趨勢...結果說穿了，這所謂的國外、世界、國際，常常指的就是美國；這些東西真有那麼好嗎？還原事實真相後，往往結果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李明洋，2015）

.....總統...表示...英國在...的發展中有領導地位，希望臺灣...能學習英國的成功經驗。然而，英國與臺灣的情況大不相同，未必是臺灣能效法的對象..（余宗翰，2018）

就理論的重要性來說，不論是政策擴散下政策學習，或是政策導向的學習領域，過去文獻都忽略了「資訊蒐集行為」的系統性分析，少數如李仲彬（2021）的實證研究，由於沒有進行各政策領域的比較，導致無法分辨不同政策的網絡差異。更重要的是，目前相關研究多是以西方為場域，沒有融入我國的地緣特徵，對我國的解釋力較弱。

在上述背景下，本研究定位為一個描述性的研究，無法也無意去評斷我國政策學習資訊來源是好或是壞，恰當或不恰當。本文主要目的是先透過文獻回顧，整理出幾個和政策學習前資訊蒐集的對象選擇行為有關的因素，然後以我國中央部會為例，針對 11 個政策領域（交通、教育、內政、經濟、農業、法務、環保、衛生、勞工、文化、財政）的歷史文件資料進行內容分析，驗證文獻所歸納出來的因素是否確實存在。在理論上，本研究的貢獻將改善政策學習研究中對於資訊選擇行為了解的不足，在實務上則做為改善我國政策學習工作的建議基礎。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為：我國在政策學習工作上所仰賴的資訊來源國家有哪些？政策學習對象之選擇工作背後的邏輯是什麼？到底是怎麼選政策學習資訊的提供者？

接下來的段落安排，第貳部份將先回顧和政策學習對象有關的文獻，第參部份為實證方法與資料說明，第肆部份為研究分析與發現，最後為結論與建議。

貳、文獻回顧

本節除了討論政策學習目前的文獻缺口外，也要透過文獻檢閱，歸納出選擇政策學習對象時的考量，作為後續實證分析的參考架構。

一、政策學習

政策學習的研究很多，大多描述政府機關因為政策成功或失敗經驗、突發事件資訊、科學發展或新技術...等資訊的出現，而觸發了一個政策的出現或變革（Nowlin, 2021），觸發的內容可能是具體的政策工具，也可能是政策方向的抽象性啟發（吳定，2017，p. 345）。若描述的事件是政府機關遇到困難而向國外政府取經、吸取經驗，將國外政策或行政作為，轉換或應用到本身機關的過程（柯于璋，2012；黃東益，2004），有人稱之為經驗汲取，或稱為政策移植（policy transfer），甚至視為是一種新的政府治理（New Governance）模式（Radaelli, 2004），若同一個政策在許多政府間不斷地被學習後採用，則稱為「政策擴散」（policy diffusion）現象⁴，如果這個學習來的政策對學習者來說，是一個從未使用過的政策，則也可以稱之為創新採用及創新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現

4. 當然，不是政策學習就一定造成政策擴散，政策擴散的原因也不只政策學習一種。政策擴散有很多原因，除了「學習」之外，還有競爭、強制、規範...等（Dobbin et al., 2007）。

象 (Rogers, 1995)。

除了上述政策擴散前的政策學習之外，政策倡導聯盟理論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ACF) 認為，政策學習是政策倡導者搜尋資訊來進行政策信念的強化或轉化之現象，ACF 論者認為，因為政策環境當中的政策推動者，傾向於尋求資訊來鞏固其對該政策的核心信念，因此公共政策通常是穩定的，然而，在一些特定的狀況出現時，例如獲得新科學證據和技術資訊，會導致信念的變化、聯盟成員變動，甚至政策立場改變，最終促成政策變遷 (policy change)，這種學習稱為「政策導向學習」(policy-oriented learning)，最終產生的不是整個社會環境中不同政府間的政策擴散，而是政府內部的政策穩定與變遷 (Sabatier & Weible, 2007)。此外，Howlett 等人 (2017)、Lee 與 van de Meene (2012) 都認為，政策學習是一個政策制定者或組織系統性地尋找、詮釋和應用一些新資訊，進而讓本身做出更明智政策決定的過程；Zahariadis (2003) 認為政策學習指政府機關透過分析以往的政策結果，並從中獲得經驗教訓來更新政策和適應社會不斷變化的過程。Rose (1993) 認為政策學習的具體方式，至少可以有以下幾種：(1) 因為得知其他地方有某個有效施行的政策，進而直接將其「複製 (copy)」後貼上到本地來實施；(2) 得知另一個地方有效施行的政策之後，將該政策依照自己地區的特性稍加修改後應用，稱之為「調適 (adaptation)」；(3) 得知兩個來自不同地區的政策後，將兩者各自的特色「混和 (make a hybrid)」出一個新的政策後應用到本地來；(4) 得知來自許多不同地區的政策之特色後，將它們「整合 (synthesis)」出一個新的政策後應用到本地；(5) 受其他地區的政策內容資訊「啟發 (inspiration)」或刺激出一個新的想法，再應用到本地來。

二、影響政策學習資訊選擇的因素

政策學習的首要步驟是先引入學習「資訊」，然後將資訊轉化為知識後，應用到自身的政策上，最終完成政策學習。其他政府的政策資訊，不論是成功或失敗的經驗，都是學習教材的基礎，政策學習是一個「知識應用的過程」（柯于璋，2012），知識的擴散啟動了政策在政府間移轉（Stone et al., 2020, p. 1）。至於一個政府究竟是如何知道得更多？被用來進行政策學習的資訊是引自哪裡？從有限理性的觀點來推斷，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完全理性地普查或掃描全境資訊，再從中選擇自己需要的資訊，而都只是選擇性地暴露（selective exposure）在某些固定的資訊來源管道中（Rogers, 1995）。因此，更適合的研究問題應該是，政府如何選擇或習慣性地暴露在哪一些資訊前？這個問題背後其實是一個認識論（epistemology）的問題，秉持不同的認識論策略（epistemological strategies），就會是不同的資訊蒐集方式，並最終從不同的地方取得資訊，因此，雖然策略與最終使用的資訊來源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一個是屬於資訊蒐集者，一個是屬於被蒐集者，但前者會影響後者。

至於資訊蒐集的策略有哪些？Rose（2005）認為有些人一開始就會只偏好友好地區、有些人則會往熟悉地區找、有些人的策略則是毫無既定目標的隨機亂看；Wilson（1997）則區分為被動注意、被動搜尋、主動搜尋、持續搜尋四種模式；Choo（2001）分成非直接性的觀察、條件觀看、制定型、搜尋型；另外，根據Freeman（2007）的歸納，政策制定者進行政策學習時，共有三種可能的認識論策略。首先，理性主義者（rationalist），此途徑假定問題與解方間存在明確的因果關係，所有的學習都是在具有科學方法基礎、各地通用之理性原則的前提上進行，知識在政策過程扮演一個工具的角色，除非政策環

境突然變化，要不然官僚通常可以針對知識、問題、解方進行研究和分析，透過比較不同地區的狀況，最終找到一個最佳解決方案。總之，學習是一個確立事實並依此傳播資訊的過程，成功政策學習背後所仰賴的知識，是特別去挑選那些經過科學驗證的、有品質的、對自己明確有用的、和自己所遭遇問題間有明確因果關係的資訊，如果最終學習失敗了，只可能是資訊不足或政策執行環境的不穩定所造成。

第二，制度主義者（*institutionalist*），這個途徑下又包含著兩種詮釋學習的方式，第一個是從組織的（*organizational*）角度來看，認為學習受制於每個組織的既定規則和程序，因此不同組織會展現不同的學習能力、不同的資訊來源、不同的資訊處理方式，組織內的成員是在組織的條件/程序下負責蒐集、編碼或解釋學習資訊，過程中會受到組織的各項制度、規定、過去推動之政策所的影響所影響。第二個角度是從觀念上（*ideational*）所產生的影響來詮釋學習的方式，這個角度認為，政策學習者會去學習他們過去已經相信、已習慣的來源，因此他們有固定的思考方式（*mind-sets*），會受到自己的「注意力習慣」（*habits of attention*）所導引，就像 Simon（1997, p. 102）從心理學上做的推論認為，行政人都有注意幅度（*span of attention*）與習慣領域（*habitual area*）的限制。在這個詮釋途徑下，政策學習者通常會較容易向和自己相似的人學習，例如類似的國家、相同語言國家，或是周遭常接觸的國家，這樣的學習模式被認為轉化資訊到自己身上所需要的成本是最小的。

最後，建構主義者（*constructionist*），此觀點認為遭遇之問題的內容，以及解決方案，都是使用者自己定義出來，或在自身執行政策的過程產生的，因此所有的知識都是「情境化下的（*situated*）」，相對於理性主義者假定知識和執行環境是分開的，建構主義認為知

識是透過執行過程產生的，政策學習不僅僅是吸收新資訊，更涉及將不同的知識框架與實踐模式拼湊（*bricolage*）在一起，形成可行政策的過程是一種「修補與創新」（*fixing and innovating*）。總之，建構主義者認為學習是一種社會化、互動、脈絡化的過程，學習者進行「知識的協商」，然後透過共識形成問題與解方，非單純的資訊傳遞或因果分析。

根據 Freeman（2007）的歸納，生產學習資訊的認識論共有三種途徑，每一途徑概念化之後都包含著幾種資訊選擇考量。除此之外，政策學習領域也有一些對資訊來源的討論，例如 Dolowitz 與 Marsh（2000）認為學習資訊可能來自於自身的過去經驗，稱之為國家內部來源（*within-a Nation*），但也可能來自外部單位，包含國際組織、國外政府機關...等，是一種跨國境的（*cross-national*）的知識傳遞。Rose（1993）認為可以依照空間（*space*）與時間（*time*）來區分，前者區分成來自外面或內部，後者可區分為來自過去或現在。柯于璋（2012）將政策學習的來源區分為內部的、外部的兩個來源。Rose（2005, p. 42）討論學習資訊選擇的邏輯，認為政府尋找政策學習資訊來源時，除了有些政策學習資訊是一種完全隨機亂看，並非來自事先設定之學習對象之外，若是一種策略性選擇，則來源對象可能會有三種：和自己友好的地區、自己熟悉的地區，以及可以提供高品質資訊的地區。Shipan 與 Volden（2008）發現，政府會向長期被認為比較創新的城市、鄰近城市以及大城市學習。Fuglister（2012）發現國家會向同屬一個合作聯盟的國家學習。Einstein 等人（2019）、Glick 與 Friedland（2014）也都發現政府會較常向地理位置鄰近的地區蒐集資訊，Stone（1999）則認為，「心理相似性」（*psychologically proximate*）通常是影響學習對象選擇很重要的因素，例如英國會比

較傾向往北美、歐盟和以往英國聯邦所屬地區尋求可以參考的經驗，西方學者更關注 OECD 國家之間的政策學習、移植，而不是拉丁美洲國家。相似性的觀點，類似 Cao (2010) 研究資本稅政策國際擴散現象時，發現網絡位置相近性 (position proximity) 所誘發的社會化機制 (包括政策學習和模仿) 會驅動各國的政策變化。所謂網絡位置相近性，指兩個國家間互動的頻率和強度，例如雙邊貿易額或共同參與的國際組織數量，該文認為：「...在網絡背景下，相近性指的是擁有高度的雙邊互動，例如貿易、直接投資以及共同參與的國際組織，政策學習通常透過認知捷徑，在相互連結的行為者之間傳遞共享資訊...」(Cao, 2010, p. 825)。Volden (2006)、Berry 與 Berry (2007) 則將這個相似性的意涵，加入同型主義 (isomorphism) 的概念，擴充至政治體制、財政預算、甚至社會特徵上。此外，也有些政策學習的對象指向一些標竿、出現奇蹟的地區，例如 90 年代西方政府領導人都在談論向「亞洲奇蹟」學習，移植日本式管理至自身地區。Lee 與 van de Meene (2012) 對於城市在氣候變遷議題上的政策學習研究發現，文化的同質性 (例如語言接近性)，以及擁有較好氣候變遷政策績效的地區，容易成為其他城市的學習對象。比較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前述從學習之政策資訊品質、適合度的角度來看，Radaelli (2004) 對歐洲地區政策學習的觀察發現，主觀性的認知、價值衝突等政治因素也會影響政策學習，他甚至認為「在政治場域當中的學習並非是一個「事實尋求」的活動，而是一個政治性活動。

三、我國地緣政治與歷史發展脈絡下的影響因素

上一小節所檢閱的文獻，大多是以西方 (尤其多以美國) 的社會環境為背景所建構而成，然而，依據 Freeman (2007) 的制度途徑解

釋論點會發現，個殊化環境特徵所產生的因素不該忽略，但上述文獻之背景與我國實務環境背景有明顯的差異。例如，以美國為背景所討論之政策擴散中的學習，通常講的是美國各州、各城市間的交流，他們的互動是自由的，是一個沒有政治或軍事霸權約束下的府際網絡，是一個沒有受到地緣政治牽絆的環境，Berry (2023, p. 8) 形容他們是：「...這些州有類似的...政治特質，他們有許多機會相互學習...」，但這個狀況與我國進行跨國官方互動、參訪學習時，常受到地緣政治、外交現實干擾，有所不同。因此，不論是來自美國或其他西方文獻所談的政策學習，都應該加入我國情境的考量。我國因為國家發展過程的種種經歷，包含從中國撤退來台之前對中國社會的認識與習慣，殖民時代受到日本政府的制度路徑依賴，以及 1945 年以後美國勢力、資源的大力入侵，都影響了我國科學或知識的發展方式(謝國雄，2011)。換言之，這些發展背景的特殊脈絡，有可能也使得我國在政策學習中的資訊行為上，出現了一些系統性的影響，本文認為，這些特殊的歷史背景脈絡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個部分。

首先，區域主義 (regionalism) 的發展。所謂區域主義，指在一定地理範圍內的一些國家，試圖透過合作或聯盟，改善他們與已開發國家的地位差異(蕭全政，2011)。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時候，臺灣被西方視為是反共的最前線，單倚賴美國的支持就可以在國際政治、安全、經濟上獲得相當程度的支撐，但從 1980 年代後期，隨著美國與加拿大成立自由貿易協定、歐盟的成立，全球經濟權力開始重構，結合同好以鞏固自身安全的做法，成為各國擴張權力的必要措施，這也是區域整合、區域主義趨勢的出現(孫國祥，2003；蕭全政，2011；鄭瑞耀，2015)。以臺灣地處的東亞而言，東南亞國家聯盟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簡稱東協) 是這個

地區區域主義的重要代表之一。東協成立於 1967 年，主要目的是促進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成長、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並維護區域和平與穩定，目前成員國有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汶萊、越南、寮國、緬甸和柬埔寨，這些國家地理位置相近，因此東協致力於成員國間的合作，雖然我國目前不是東協的會員國，但因為我國本身戰略位置、經濟實力的關係，從 1980 年代以後，我國就以各種方式與東協的國家互動，變成隱藏性成員，例如南向、新南向政策的推動，就是在與中國大陸的緊張關係下，為了分散我國對大陸的經濟依賴，因此加強與東南亞及南亞國家的合作，建立多元化的經濟合作模式，新南向政策不僅聚焦於經貿合作，也強調了「人民對人民」的交流，如教育、文化及觀光等領域的互動（陳鴻瑜，2021）。總結來說，區域國家對臺灣的重要性不僅展現在經濟層面，也涵蓋了區域安全與文化教育的連結，因此，政府進行合作、交流的工作時，區域國家（例如東協的會員國）將是很重要的選擇。依此，本文認為，我國政府對外尋求政策學習資訊時，也會因為區域主義的影響而更容易向區域聯盟內的政府取得資訊。

第二，被殖民記憶的延續與國際霸權力量的影響。東亞地區從十九世紀到現在，至少經過四個霸權時期，分別是中國（1842 年前）、英國（1860-1905）、日本（1918-1941）與美國（1945 迄今），而對我國而言，從建國以來，受到日本與美國的影響尤為甚（蔡東杰，2013）。具體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被殖民的一些國家雖然脫離強權的政治和軍事壓迫，但實際上，只是改成透過其他力量來加以控制，甚至藉由協助現代化、科學化的方式，使殖民關係由政治經濟轉為思想文化、知識的殖民，透過教育、媒體的植入，使新興國家持續依賴原來的霸權國，甚至放棄或忽略自身本土文化也在不惜，此稱

為「文化殖民主義」(章五奇, 2010)。我國受文化殖民的影響很深, 從日本殖民時代開始, 日本在臺灣實施的軟硬體工程都相當巨大, 致使我國人民對日本這個國家之現代化、文化相當熟悉, 甚至崇拜, 而這樣的記憶一直持續到了現今, 我國社會許多角落都還是相當容易看到對日本文化的追逐。此外, 從國民政府對抗中共時期, 到了戰後, 「美援」對我國的重要性不減, 而這樣的狀況也讓我國許多地方都出現了對美國的習慣性依賴, 不論是政府的政策發展、產業技術發展, 或是相關的學術發展, 都會大量以美國為中心。「美國」對我國的重要性, 可以輕易地從政治菁英發言內容所用的辭彙當中被發現(吳思緯, 2022)。即使在學術上, 美國也是扮演著學術霸權、提供知識之來源的角色, 我國許多學者甚至會想要倚賴美國學術界所發展出來的理論, 透過「美國仙丹」來快速增加自己的國際化程度(施正鋒、吳珮瑛, 2009)。這個狀況影響到各種政策設計上, 以教育政策為例, 卓恒瑾(2023)發現,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 臺灣因為在國際政治與文化實力上屬於半邊陲國家, 教育系統發展受制於核心國家如美國的影響, 教育政策常會隨著核心國家潮流變遷; 侯元鈞(2005)也認為, 我國教育體系受到西方文化霸權與意識型態的支配, 使我國的教育制度被西方殖民, 出現「文化主體喪失」以及「去脈絡化」的狀況。

第三, 從工業革命開始, 西方科技的快速進步, 晚清開始對於「現代化」, 或「西學」的崇拜, 讓學術領域至今仍缺乏在地社會的相關理論, 本地學者所撰寫的科學論文, 都是在以臺灣的情境來驗證西方理論, 或者為了西方理論做出因應臺灣在地經驗的註腳, 最終還是在擴大西方理論的解釋力(鄭志成, 2015)。這種情況如果加上英語在學術上的強勢, 中文在學術上的弱勢, 則更為加劇, 因為語言是

學術權力分配的重要工具，英語支配了大部分的學術出版與國際知識交流運用，臺灣因非屬英語系國家，在全球知識體系中處於邊緣的位置，扮演的是西方（英語為基底的）知識的消費者和傳播者（陳明莉，2003），缺少「地緣文化式知識論」（geocultural epistemologies）下，也就是知識的生產、傳播與認識方式受到地理與文化因素影響後所發生的產製（楊昊，2015）。總之，在學術研究領域當中，位處知識中心、擁有知識霸權的國家中的學者，譬如美國、英國、以及法國，或是半邊陲（semi-peripheral）的國家如澳洲、日本、荷蘭以及德國，皆會透過期刊論文、學術專書、研究報告、或是舉辦國際研討會的方式，將想法或知識傳遞全球（施正鋒、吳珮瑛，2009），而這樣的知識產製模式，讓我國政府在對外追尋知識的時候，會以傳統知識霸權國家為主。

第四，因為兩岸政治的變化，我國政府對於來自中國之「知識」的定位，有著相當隱晦不明的關係，一方面因為語言、文化與歷史的鑲嵌，取自中國的政策資訊不僅符合以往政策學習文獻所說的心理相似性、文化同質性，更加上了地理鄰近性的優勢，理當應該是我國很重要的參考來源，但上述特徵是否確實造成學習，則又長期與兩岸政治關係的情勢產生交互作用，兩岸關係緩和的時候，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相互學習互動頻繁，反之則會有去中國化、追求本土化、臺灣化、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倡議，知識尋求的行為與政治情形鑲嵌，導致「中國」相關的知識到底應該被定位為什麼，變成是一個敏感、曖昧不明的議題。上述狀況在 1970 年代以後因我國外交情勢加速險峻、被國際孤立後更加的複雜（蕭全政，2000）。目前看起來，對「中國」的相關知識產製者，通常會先思索社會如何看待臺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先決定面對中國的身分策略，再來決定對中國研究的知識生產方式（石之瑜、包淳亮，2022）。

四、彙整：政策學習對象的來源

歸納前兩小節文獻檢閱，以西方文獻中幾個常被用來討論政策學習對象選擇的觀點來看，政策學習對象的來源可以依空間、時間、資訊特徵、認識論、理性程度區分。其中，針對空間的區分，又可以分成組織類型，以及組織特徵/關係；依時間的區分，則主要是討論學習的標的政策是已經過去式，或正在進行；依照資訊特徵所做的區分，則至少可以分成來自成功者的資訊、清楚可見資訊、資訊完整程度、資訊可得性等不同指標；而認識論策略則可以分成理性主義思維、制度主義思維、以及建構主義思維三種；理性程度則是分成隨機、有限理性、完全理性三個等級；再結合我國特殊地緣政治與歷史脈絡，則可以新增區域主義、政治與軍事霸權、現代化與西學、與中國紐帶關係四個因素所產生的政策學習資訊網絡來源或特徵（表 1）。

必須強調的是，這些資訊來源的屬性特徵，很可能有「共線」的狀況，因為這些不同文獻間的差異，有時候只是對同一個特徵的不同描述、不同觀察框架而已，其實是相同的概念，舉例而言，友好的國家可能就是資訊較可得的國家，而心理相似程度高的國家，可能指的就是那些文化相似的國家、同文同種、語言相同的國家，也就是被認為資訊可及性高的國家。本文認為，也是因為概念的模糊性、不可量化性、或甚至不可切割性，要客觀地操作化這些概念並進行觀察分析，相當困難，導致目前實證研究缺乏的現況，而本文能做的，就是盡可能操作化一些概念進行初探，作為後續研究的基礎。

表 1

彙整西方文獻及我國脈絡後所歸納之政策學習的可能對象

分類策略	分類方式	說明	
空間 (Rose, 1993)	組織類型 (Dolowitz & Marsh, 2000)	外部非政府機關：人民團體、企業、國際組織	
		內部政府機關：自身機關內其他單位	
		外部政府機關：國內外其他政府機關	
	組織特徵 / 關係	心理相似性	主觀上認為與自己相似的地區 (Psychologically proximate) (Shipan & Volden, 2008)
		文化同質性	語言與區域近似地區 (Lee & van de Meene, 2012)
		組織相近性	向組織結構/制度和自身很像的地區蒐集資訊 (Berry & Berry, 2007; Volden, 2006)
		地理鄰近性	向地理位置鄰近自己的地區蒐集資訊 (Einstein et al., 2019)
		位置相近性	政策學習通常透過認知捷徑，透過高度連結活動 (例如貿易、相互投資、或同屬某些國際組織) 而產生位置相近之行為者間的資訊共享 (Cao, 2010)
		友好度	向與自己友好的地區蒐集資訊 (Rose, 2005)

時間 (Rose, 1993)	現在	向任何其他單位的現行做法學習
	過去	向任何其他單位的過去作法，或是自身過去進行學習
資訊特徵 (Weyland, 2006)	成功者或標竿者	被公認為具有該政策領先地位的地區
	資訊可見者 (visible)	向政策資訊外顯程度高者（例如具有完整的書面報告、影片…等），而非默會知識為主者
	資訊完整者 (detailed)	向外顯資訊相當完整者，也就是提供的資訊可以包含人事時地物，面面俱到
	資訊可得者 (accessible)	願意提供資訊或資訊取得容易者
認識論策略 (Freeman, 2007)	理性主義	特別去挑選那些經過科學驗證的、有品質的、對自己明確有用的、和自己所遭遇問題間有明確因果關係的對象
	制度主義	依循組織現有制度、習慣而出現的對象，學習對象的選擇是一種「注意力習慣」下的結果
	建構主義	學習對象的選擇是來自於個殊情境下進行自我定義的結果
理性程度 (Rose, 2005; Weyland, 2006)	隨機搜尋	沒有任何系統性的邏輯、規則可言
	有限搜尋、捷徑搜尋	在可行、可及的範圍內，盡可能完整的搜尋
	全境的資訊搜尋 (wide-ranging search)	蒐集到完全資訊之後再選擇的模式

我國特殊地 緣政治與歷 史脈絡	區域主義	依照我國南向、新南向政策的範圍，向東協、紐西蘭、澳洲…等相關國家尋求資訊與知識
	殖民記憶與霸權影響	因為殖民歷史、霸權控制所延續的文化殖民效果，造成偏向以日本、美國兩個國家為學習對象
	現代化與西學力量 (受知識霸權影響)	因為崇尚現代化、西學的經驗，容易向被歸為學術霸權、學術半邊陲國家尋求資訊
	與中國的紐帶關係	因兩岸文化及制度的歷史鑲嵌，我國向中國政府進行學習的態度，出現積極與迴避皆有的現象。1980年代後中國快速發展，加上語言、文化相近與資訊可及的優勢下，兩岸出現許多相互學習動作(尤其是國民黨執政期)，但近年民進黨政府期間，向中國的學習變成一個比較隱晦、敏感的議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歸納整理。

參、研究方法

從上述文獻回顧當中得知，政策學習的資訊來源選擇有許多機制，背後包含許多分類法。為了回答本研究的問題，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透過政府文件紀錄找出「所有可能被學習的對象」中，哪些對象已被我國政府選擇了？哪些對象沒有？換言之，本研究以全世

界近兩百個國家為「潛在的被（我國）學習者」，蒐集這些國家的兩個關鍵變數資料：（1）被我國學習的次數（變數編號為 X1）。（2）這些國家之特徵，特徵的操作化主要是以表 1 為基礎去選擇可操作化的概念進行，最終區分成十個變數（編號為 X2 至 X11）。以下兩小節分別說明資料蒐集過程，以及上述兩個變數的計算方式。

一、各國被我國學習之次數（X1）的計算：內容分析法

本研究以行政院二級機關之三種文件做內容分析：1) 業務與績效相關文書報告；2) 委外研究（透過 GRB 系統取得）；與 3) 出國報告⁵。除委託研究報告因資料龐大而只包含兩年度外，其餘都含 2012 至 2019 年共八個年度（詳見表 2）：⁶

-
5. 必須特別說明的是，這三種文書資料中的「委託研究報告」撰寫者是受委託機構，並非出資的政府機關自身，因此有可能與政府機關有不同的看待問題方式及資訊偏好，不能直接代表政府，與另外兩份文書資料是直接由政府自身撰寫不同。由於本文確實無法從委託研究報告書的文字資料上明確區分出編碼內容是委託單位或是受委託單位的意識，造成研究限制，為了減低偏誤，本文在後面的分析中，會將三份資料分開呈現，最後再一起討論。
 6. 決定文書資料的內容範圍後，本研究在經費限制、研究時間限制、與資料完整性因素的綜合考量下，將資料的涵蓋年度訂在 2012 年至 2019 年。選擇這段時間的原因是，行政院二級機關自 2012 年起陸續組織改造與調整，此外，第八屆立法委員於 2012 年 2 月 1 日就任，第九屆立法委員任期為 2016 年 2 月 1 日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本研究之資料時間範圍，剛好可涵蓋完整的第八屆與第九屆立法院業務報告，分別是國民黨與民進黨執政的兩個任期，如此可以在有限的研究資源下蒐集到多元性最高的資料。此外，雖然本文有蒐集八個年度的資料，但實際分析時會將各年度資料組合（pooled）在一起，原因是雖然官方文書有「出版（公告）」日期，但這個出版（公告）日期和「發生學習事件」的日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出版日期不等於學習日期，舉例而言，本文無法排除 2012 年的政府業務報告書內所記載的學習事件發生在 2011 年以前的可能性，總之，本研究資料當中的日期只能代表本研究的資料範圍，而這個資料範圍的合理性，主要是綜合考量本研究資源、資料之多樣性而來；再者，本研究也曾經考慮從段落文字裡面編碼出該學習事件的發生日期，但除了出國報告有明顯寫出出國的日期之外，其他資料很少提到這個學習導入我國政府的日期。

表 2

文字內容分析的資料種類與來源

資料對象	類型	資料內容與時間範圍	資料下載來源
行政院 所屬二 級機關	1) 業務 與績 效相 關文 書	第八屆與第九屆立法院業務 報告	機關之官方網站
		2012-2018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註 A	機關之官方網站
		2012-2019 年其他出版品	機關之官方網站
	2) 委外 研究	2018-2019 年政府研究計畫 (GRB) 註 B	GRB 政府研究資訊 系統
	3) 出國 報告	2012-2019 年公務出國報告	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

註 A：由於 105 年度施政計畫經行政院於 105 年 2 月 16 日函頒後，行政院同年 5 月 20 日後陸續提出多項重大施政未及納入，105 年度績效報告僅供機關內部參考，無法取得該年度績效報告。108 年度之施政報告於 2020 年 3 月公布，本研究當時已結束資料蒐集工作，因此並未納入。

註 B：因為部分研究報告為限閱或機密報告，並未公開成果報告，本研究僅蒐集 GRB 系統有公開之報告電子檔。另外，也因為政府研究資料龐大，受資源與時間限制，本研究僅以當時之近兩年（2018-2019）有公開之電子全文進行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歸納整理。

文字內容分析的流程做法步驟如下：

1. 取得檔案：下載表 2 官方文書電子檔。
2. 段落提取：透過 R 語言撰寫段落擷取程式，從上述官方文書中萃取出符合關鍵字條件（圖 1；交集 A、B 兩類關鍵字）的「段落」（每段落為 700 個字）供後續編碼分析。⁷

圖 1

文字「段落」提取的關鍵字條件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本研究以上述步驟從 650 個「績效與業務報告」檔案中萃取出 3,672 個「段落」；從 1,926 個「委託研究報告」檔案中萃取出 39,010 個「段落」；出國報告則共分析了 13,769 份。若將三類資料加總起來，作為編碼判讀來源的「段落」總共有 56,451 個，總分析文字量超過四千萬字。

3. 進行「學習次數 (X1)」的編碼：針對 56,451 個「段落」進行逐一人工閱讀，判斷該段文字是否紀錄了我國某一部會學

7. 由於本文的編碼是用「國家名」交集「學習、參考、根據...」等字眼，並經過編碼員逐一判讀，因此，編碼後的學習事件已可以盡可能排除掉那些將國外資訊忽略或置之不理的狀況，也就是這些國外資訊不管最終是否產生實際的政策影響，但至少在本國政府機關中產生認知上的改變。

習國外政策的事件，若是有的話，則在「那一個」被我國學習的「國家」劃記 1 次，並劃記學習者（部會）是誰。舉例而言，在教育部 102 年度績效報告中可見以下段落文字，此時「德國」就會在教育部學習對象中被劃記一次。編碼是由三位受訓後的編碼員進行，編碼的品質經過信度檢測，相互同意值介於 0.940-0.997 之間。

……前年度行政院複核綜合意見辦理情形（一）加強校園基礎建設…（二）參照德國職業教育「二元制」特色，研擬實習計畫，從學生就業、產業發展…完善我國實習制度，俾利縮短學用落差…所謂「雙軌制（二元制）」……

二、學習次數（X1）：依 11 大政策領域區分

根據政策網絡理論與 Freeman（2007）制度主義的認識論途徑觀點，不同政策領域會有不同的學習網絡（接觸對象），因此，本研究除了記錄每一個國家被我國學習的次數之外（X1），也進一步編碼每一次「學習」是發生在我國哪一個政策領域上，以作為政策領域的比較。至於政策領域的歸類編碼，由於本研究 X1 的資料來源主要是來自於各部會的文書資料，考量政策領域操作化的方便性，本研究依照資料的部會來源定義出 11 個政策領域（機關）的資料，分別是：1.內政政策領域（內政部）；2.司法政策領域（法務部）；3.教育政策領域（教育部）；4.經濟政策領域（經濟部）；5.交通政策領域（交通部）；6.農業政策領域（前農委會）；7.環保政策領域（前環保署）；8.衛生福利領域（衛福部）；9.勞工政策領域（勞動部）；10.文化政策領域（文化部）；11.財政領域（財政部）。除了上述 11 個（領域）機關之外，後來成立之數發部因為沒有文件資料，外交部及國防部因有許多與國外的互動屬機密性質，不確定資料是否完整，其餘機關因

為業務內容多橫跨數個政策領域（例如人事總處、公平會、中選會...等），政策領域歸類比較複雜，因此都不列入本文研究範圍，後面的分析都將這些部會刪除。

二、對應理論概念的假設與變數操作化（X2-X11）

根據前面的文獻檢閱（請見表 1），政策學習對象來源有很多區分方式，但甚少針對這些類別進行實證分析，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學習對象的類型特徵不僅難以避免共線的狀況，操作化也困難，例如依照資訊特徵所做的分類（包含資訊可取得性、完整性、可見性...等），雖然在概念定義是清楚的，但操作化測量大多是用在討論人員「個別（individual）」層次的學習，並透過問卷測量，而這樣的作法在公共政策領域以政府為分析單位的議題上，是不可能的。

因此，本文在後續的操作化動作，僅能從表 1 所談到的幾個概念當中，選擇幾個較容易操作化的概念進行假設與分析。必須承認的是，本文無法包含表 1 中全部概念，尤其是理性邏輯下所推導出來，學習者會刻意選擇被驗證的成功者、標竿者，或是經過科學驗證的、有品質的、對自己明確有用的、和自己所遭遇問題間有明確因果關係的對象資訊，究竟每個政策領域是哪些國家具有上述特徵，實在無法客觀界定並取得資料，這是很大的研究限制。本研究最終的操作化結果如表 3，總共有十個變數，前七個是依照傳統政策學習與擴散文獻所得，分別是 X2 政治關係、X3 經濟關係，X4 地理關係、X5 交通關係、X6 語言可及性⁸、X7 政府體制相近關係，後面四個則是結合

8. 語言可及性（accessibility）這個變數背後想要捕捉的概念意義是學習者是否容易取得該國的政策資訊，也就是資訊可及性。而本文認為，因為政策資訊經常被記錄在官方文書裡面，若文書容易閱讀也就容易取得政策資訊。對我國公務同仁來說，全世界的語言當中，最熟悉的大概是中、英、日語，英語是我國外語教育的主要語言，而日語因為常包含漢字的關

制度主義與我國特殊地緣政治與歷史發展脈絡所建置，包含 X8 區域主義關係⁹、X9 殖民與霸權者、X10 知識霸權力量、以及 X11 與中國的紐帶關係。表 3 中的第一欄是這些變數對應的理論概念，至於各個變數背後邏輯所衍伸的研究假設（hypothesis）、資料的屬性編碼與來源，請見表 3 後三欄。

表 3

被學習者（其他國家）的特徵類型、操作化編碼及假設

對應概念 (請見 表 1)	變數 (X)	文獻基礎→假設 (H)	操作化編碼	資料來源 /依據
依空間分 - 依組織 關係 - 友 好度	X2 政治 關係	友好度對取得資訊的 容易度有幫助 (Rose, 2005)→H1 向與我國 有邦交關係國家學習 的次數，會高於向僅 互設代表處「或」無 邦交國家學習的次數	1=是我國邦 交國、2=與我 國互設代表 處、3=無正式 外交關係	我國外交部 網站

係，至少可以猜出大部分的意思，而除了這三種語言之後，其他語言都必須透過專業的翻譯機制才有辦法閱讀。此外，本文審查委員建議，將中文、日語、英語三個類別獨立分開分析，但因為「日語」就只有是日本一個國家的官方語言，將「中文」列為官方語言之一或唯一的，也只有兩個國家（新加坡、中國），若將這三個語言分開，日語與中文類別的樣本數就只有 1 與 2，都無法成為獨立一類進行平均數的比較。

9. 根據黃東場（2008）對於我國第一波「南向」政策的歸納，對象國家包含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越南、汶萊等七個國家，加上蘇翊豪（2016）、陳鴻瑜（2021）對於「新南向」擴充至寮國、緬甸、柬埔寨、紐西蘭、澳洲等國家的觀察，以及楊昊（2017）認為新南向也包含印度。我國在區域聯盟的對象上，基本上就是東協的十個會員國，加上印度、紐西蘭與澳洲。

對應概念 (請見 表 1)	變數 (X)	文獻基礎→假設 (H)	操作化編碼	資料來源 /依據
依空間分 - 依組織 關係- 位 置相近性	X3 經濟 關係	互動頻率高(例如貿易量高)的行為者, 共享資訊的機會較高 (Cao, 2010)。→ H2 向經濟鑲嵌高(雙邊貿易高)國家學習的次數, 會高於鑲嵌較低的國家	因我國年出口平均約 10 億美金、進口約 14 億美金: 1=高經濟鑲嵌國家(進、出口皆超過平均)、2=中等經濟鑲嵌國家(僅出口或進口其中一項超過平均)、3=低經濟鑲嵌國家(兩者皆低於平均) ¹⁰	經濟部國貿局 網站 ¹¹
依空間分 - 依組織 關係- 地 理鄰近 性; 依資 訊特徵分 - 資訊可 得者	X4 地理 關係	向鄰近地區取得資訊會比較容易 (Einstein et al., 2019; Glick & Friedland, 2014; Fuglister, 2012) → H3 向東亞國家學習的次數, 會高於其他地區國家	0=非東亞的亞洲國家、1=東亞國家、2=非亞洲國家	蔡東杰 (2013, 頁 5)

10. 必須說明的是, Cao (2010) 認為兩國的貿易量達該國總貿易量「重要比例」(important proportion) 之後, 兩國之間的資訊交換會增加。而本文編碼時用高於、低於平均來界定「重要比例」是否是最好的方式? 若採用不同方式計算「重要比例」, 結果是否仍維持穩健 (robustness)? 例如以前 10 大進口國和出口國家區分相近性, 則結果是否不同? 或是僅挑選佔我國出口或是進口貿易額 30% 以上的國家作為主要貿易夥伴呢? 或以前 5 大貿易逆超國和順超國分別比較, 結果是否會不一樣? 本文編碼是本文的主觀選擇, 並未有理論支撐, 是本文的限制, 或許未來可以不同的測量編碼重複驗證這個變數的效果。

11. 本文自經濟部國貿局下載 2012-2019 年間共八年的資料(但有些國家並非八年都有, 有些國家在一些年度上有遺漏值), 排除遺漏值後, 再進行各國的平均計算。

對應概念 (請見 表 1)	變數 (X)	文獻基礎→假設 (H)	操作化編碼	資料來源 /依據
	X5 交通 關係	同上→ H4 向不須轉機即可抵達國家學習次數，會比須要轉機才能抵達的國家多	我國至該國是否需要轉機：0=不須轉機、1=須轉機	本研究透過機票搜尋平台自建
依資訊特徵分-資訊可得者	X6 語言 可及性	相似語言環境的地區，相互學習關係比較容易出現 (Lee & van de Meene, 2012) → H5 向(對我國)語言可及度高(含中日英語)國家學習的次數，會比向語言可及度低國家學習次數多	該國官方語言是否包含我國國民相對熟悉的中、日、英三種語言：0=語言可及高(包含中日英)、1=語言可及低(不包含中日英)	The World Factbook
依空間分-依組織關係-組織相近性	X7 體制 相近 關係	向和有相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取得的經驗資訊，比較合適自己 (Einstein et al., 2019; Gilardi, 2016) → H6 向總統與半總統制國家學習次數，會比向君主立憲、專制國家學習次數多	該國屬於哪一類國家？ 1=專制國家、 2=議會與君主立憲、 3=總統與半總統制國家	我國外交部網站；The World Factbook
制度途徑；我國特殊地緣政治與歷史脈絡	X8 區域 主義 關係	由於區域主義的關係，1980 年代以後，我國就加強了與東南亞、南亞國家的合作 (陳鴻瑜, 2021) → H7 向東協國家學習的次數，會比非東協國家多	該國是否是我國區域聯盟對象？東協國家、南向與新南向國家=1，其他為 0	黃東場 (2008)、蘇翊豪 (2016)、楊昊 (2017)、陳鴻瑜 (2021)

對應概念 (請見 表 1)	變數 (X)	文獻基礎→假設 (H)	操作化編碼	資料來源 /依據
	X9 殖民與 霸權	H8 因為殖民與霸權記憶的影響，我國向日本、美國學習的次數會高於其他國家	日本、美國=1，其他為 0	本研究 自建
	X10 知識 霸權	H9 因為軍事與政治霸權延伸而來的知識霸權現象，我國向七個知識霸權國家學習的次數會高於其他國家	美國、英國、法國三個知識霸權，以及澳洲、日本、荷蘭、德國四個半邊陲知識霸權國家，總共七個國家=1，其他為 0	施正鋒、吳珮瑛 (2009)
	X11 與中國的 紐帶 關係	H10 因為和中國的紐帶關係，對中國學習的次數會高於其他國家	中國為 1，其他為 0	本研究 自建

資料來源：本研究歸納整理。

肆、研究發現

本節將分別呈現 11 個政策領域對外政策學習時，各個來源類型國家被學習次數的高低（以三種政府文書進行內容分析編碼而成的 X1），與這些國家之特徵（X2 至 X11）的雙變數關係，進而回答哪

些特徵國家比較容易成為我國學習對象的問題。若該來源屬性特徵為二分變數，本研究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若被分為三類以上，則使用單變異數分析進行假設驗證。

後續分析結果表格的呈現方式，為了篇幅的精簡，僅呈現出分組被學習次數平均（X1）、檢定結果（t 值或 F 值）兩種數值，分組被學習次數平均指「該政策領域八年期間累計對某類型國家的總學習次數 / 該類型國家數」，例如表 4 的左上角的內政領域出國報告，15 個邦交國當中，只累計看出有 1 次學習事件，因此 $1/15=0.0666$ ，四捨五入後變成 0.07，而僅設代表處的 59 個國家累計被我國學習次數是 392，故 $392/59=6.64$ 。

一、學習對象的選擇是否和政治關係（X2）有關？

首先，表 4 顯示，若以三種來源的加總來看，不論是哪一個政策領域，向不同政治關係類型國家的學習次數，都有顯著的差異。其中，向有「僅互設代表處」之國家學習的次數都是最多的（以內政領域為例，向這 59 個國家學習的平均次數為 9.18 次），比「無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和「邦交國」都高（以內政領域為例，這兩類國家分別被我國學習的平均次數為 0.4 次與 0.06 次）。「邦交國」被我國學習的次數，幾乎所有領域都是最低的（除了文化領域與財政領域外），猜測這與我國的「邦交國」多屬發展中國家有關，這類國家就政策的品質上通常不會是我國的學習對象。

整合來說，本文發現，我國 11 個政策領域在政策學習資訊來源對象的選擇上，與政治關係類型有關，各政策領域都較偏好向我國有互設代表處（但非邦交國）的國家學習，較不常向邦交國，以及與我國政治關係較為薄弱的「無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學習。

表 4

各政策領域向不同「政治關係」(X2) 國家進行政策學習次數的差異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邦交國	僅互設代表處	無正式外交關係	總計	邦交國	僅互設代表處	無正式外交關係	總計	邦交國	僅互設代表處	無正式外交關係	總計	邦交國	僅互設代表處	無正式外交關係	總計	
國家數	15	59	125	199	15	59	125	199	15	59	125	199	15	59	125	199	
內政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0.07	6.64	0.3	2.17	0	2.03	0.09	0.66	0	0.51	0.02	0.16	0.06	9.18	0.40	2.98
	F 檢定	F=10.881***				F=8.287***				F=12.015***				F=10.759***			
經濟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0.73	25.1	1.60	8.51	0.00	11.29	0.59	3.72	0.13	1.02	0.08	0.36	0.87	37.4	2.27	12.59
	F 檢定	F=16.494***				F=11.29***				F=19.848***				F=15.66***			
教育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0	6.81	0.9	2.59	0	0.92	0.06	0.31	0.13	2.51	0.05	0.78	0.13	10.2	1.01	3.68
	F 檢定	F=9.082***				F=15.951***				F=27.224***				F=15.355***			
交通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0.07	22.95	1.62	7.83	0	5.63	0.34	1.88	0	0.83	0.02	0.26	0.07	29.4	1.99	9.97
	F 檢定	F=10.079***				F=12.577***				F=8.961***				F=10.979***			
法務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0.07	4.58	0.42	1.63	0	1.05	0.01	0.32	0.27	1.73	0.03	0.55	0.33	7.36	0.46	2.5
	F 檢定	F=7.651***				F=12.314***				F=14.848***				F=11.715***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邦交國	僅互設代表處	無正式外交關係	總計												
農業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0.27	21.7	1.7	7.53	0.07	2.58	0.06	0.81	0	0.36	0.02	0.12	0.33	24.6	1.78	8.45
	F 檢定	F=11.943***				F=12.323***				F=11.451***				F=12.467***			
環保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0	7.56	0.62	2.63	0	0.93	0.03	0.3	0	4.1	0.11	1.29	0	12.59	0.76	4.21
	F 檢定	F=9.704***				F=7.559***				F=16.968***				F=12.471***			
衛生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0.2	20.4	1.22	6.85	0	1.95	0.08	0.63	0	1.42	0.03	0.44	0.2	23.85	1.33	7.92
	F 檢定	F=12.839***				F=10.192***				F=12.067***				F=13.016***			
勞工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0.00	3.66	0.10	1.15	0.00	4.56	0.11	1.42	0.00	0.37	0.01	0.12	0.00	8.59	0.22	2.68
	F 檢定	F=10.723***				F=14.078***				F=11.631***				F=13.424***			
文化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0.07	3.27	0.91	1.55	0.00	1.15	0.05	0.37	0.07	0.47	0.04	0.17	.13	4.9	1	2.09
	F 檢定	F=1.719				F=19.629***				F=11.09***				F=3.54*			
財政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0.07	4.97	0.18	1.59	0.00	0.12	0.01	0.04	0.13	0.37	0.00	0.12	0.2	5.46	0.19	1.75
	F 檢定	F=26.469***				F=4.538*				F=13.157***				F=27.713***			

資料來源：本研究歸納整理。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二、學習對象的選擇和經濟關係（X3）有關？

表 5 顯示，不論是哪一個政策領域，三種來源文書資料幾乎都指出我國向和我國有不同經濟鑲嵌程度國家學習的次數，具有顯著差異。其中，向與我國有「高度經濟鑲嵌」之國家學習的平均次數都是最多的，遠高於其他兩個經濟鑲嵌程度國家。例如，以三種資料加總的數據來看內政領域，20 個高度經濟鑲嵌的國家被我國學習的平均次數是 23.8 次，遠高於中度與低度經濟鑲嵌國家的 1.45 與 0.37 次。¹²

整合來說，本文發現，我國 11 個政策領域的學習對象選擇邏輯，與經濟關係類型有關，較常向和我國有「高度經濟鑲嵌」的國家學習，而幾乎不會向與我國只有中度或低度經濟鑲嵌的國家尋求政策學習資訊。

12. 本文對 X3 這個變數的編碼是以我國與他國貿易量是高於或低於平均來區分出高、中、低三類的經濟鑲嵌（請見表 3）。但不同的資料編碼標準或許會有不同的結果，需要重複驗證。因為本文無法找到一個具理論基礎的分類標準（例如該用前 5 大或前 10 大貿易國，不用平均而是用前 30%，是否要考慮入超或出超國的差異...等），因此為了讓這個變數的發現有更多資料可以佐證，本文另將這個變數所使用的貿易金額，以原始測量尺度型態依高至低排序（屬於連續尺度，但有許多的極端值），然後以序位數（藉此移除極端值現象）與本文的依變數進行相關性分析，得到的結果是：1.對該國出口額金額的排序、2.對該國出口金額佔我國總出口額金額之百分比的排序、3.該國進口我國之金額的排序、4.該國進口我國金額佔我國總進口金額之百分比的排序、5.出超金額（出口-進口）的排序，前四個與我國對其政策資訊的使用次數有顯著的負相關（排序越高、學習資訊使用次數越低），第五個則沒有顯著關係。而這個分析結果與本文所使用之編碼的分析結果解讀相同，也就是進口或出口貿易量越高（經濟鑲嵌愈高），政策學習資訊的使用次數越高，而增加的解讀資訊是，入超國與出超國則沒有差異。

表 5

各政策領域向不同「(X3) 經濟關係」國家進行政策學習次數的差異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高度 經濟 鑲嵌	中度 經濟 鑲嵌	低度 經濟 鑲嵌	總計	高度 經濟 鑲嵌	中度 經濟 鑲嵌	低度 經濟 鑲嵌	總計	高度 經濟 鑲嵌	中度 經濟 鑲嵌	低度 經濟 鑲嵌	總計	高度 經濟 鑲嵌	中度 經濟 鑲嵌	低度 經濟 鑲嵌	總計	
國家數	20	11	161	192	20	11	161	192	20	11	161	192	20	11	161	192	
內政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17.2	1.36	0.3	2.13	5.2	0	0.06	0.59	1.4	0.09	0.01	0.16	23.8	1.45	0.37	2.87
	F 檢定	F=42.565***				F=31.604***				F=56.209***				F=42.246***			
經濟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57.05	18.73	1.20	8.03	28.7	0.91	0.30	3.29	2.50	0.18	0.10	0.35	88.25	19.82	1.60	11.67
	F 檢定	F=64.879***				F=51.036***				F=92.543***				F=64.675***			
教育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15.65	1.55	0.55	2.18	1.75	0.45	0.1	0.29	6.1	0.27	0.17	0.8	23.5	2.27	0.82	3.27
	F 檢定	F=81.081***				F=29.012***				F=115.204***				F=105.916***			
交通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59.8	5.64	0.84	7.26	13.2	0.82	0.31	1.68	2.3	0	0.02	0.26	75.3	6.45	1.18	9.2
	F 檢定	F=49.020***				F=45.628***				F=38.144***				F=50.896***			
法務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11.65	1.27	0.2	1.46	2.5	0.27	0.03	0.3	3.9	0.27	0.11	0.52	18.05	1.82	0.35	2.28
	F 檢定	F=37.073***				F=36.340***				F=44.800***				F=47.961***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高度 經濟 鑲嵌	中度 經濟 鑲嵌	低度 經濟 鑲嵌	總計												
農業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55.9	6	1.03	7.03	6.1	0.27	0.09	0.72	0.8	0	0.03	0.11	62.8	6.27	1.15	7.86
	F 檢定	F=61.543***				F=43.124***				F=31.432***				F=60.385***			
環保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18.45	4.55	0.22	2.37	2.25	0.18	0.02	0.26	10.6	0.27	0.09	1.19	31.3	5	0.33	3.82
	F 檢定	F=45.469***				F=24.050***				F=87.436***				F=55.578***			
衛生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49.95	8.18	0.97	6.48	4.85	0.27	0.02	0.54	3.3	0.36	0.05	0.41	58.1	8.82	1.04	7.43
	F 檢定	F=50.846***				F=42.235***				F=35.643***				F=50.338***			
勞工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9.45	1.00	0.14	1.16	10.75	0.73	0.22	1.34	1.05	0.00	0.01	0.11	21.25	1.73	0.37	2.62
	F 檢定	F=38.163***				F=44.238***				F=57.792***				F=45.528***			
文化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8.85	1.00	0.06	1.03	2.65	0.27	0.07	0.35	1.15	0.27	0.04	0.17	12.65	1.55	0.17	1.55
	F 檢定	F=64.339***				F=68.79***				F=41.458***				F=76.328***			
財政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11.10	4.09	0.22	1.58	0.35	0.00	0.00	0.04	0.95	0.09	0.02	0.13	12.4	4.18	0.25	1.74
	F 檢定	F=96.156***				F=24.258***				F=45.347***				F=109.434***			

資料來源：本研究歸納整理。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三、學習對象的選擇和地理關係（X4）有關？

表 6 顯示，除了法務領域與財政領域的委託研究報告書之外，其他所有領域的所有資料都顯示，和我國向不同地理鄰近程度國家的學習次數，有顯著差異。向「東亞國家」學習的次數比向「東亞外的亞洲國家」以及「非亞洲國家」都多。以經濟政策領域為例，三種資料加總數據顯示，我國向 19 個東亞國家學習的平均次數是 67.05 次，向東亞外的亞洲國家學習的平均次數是 2.07 次，向非亞洲國家學習的平均次數是 7.69 次，三者有很大的差別。

整合來說，本文發現，我國 11 個政策領域的學習對象選擇邏輯，與地理鄰近關係有關，最常向位處「東亞」的國家學習，其次是非亞洲國家，再其次是東亞外的亞洲國家。

表 6

各政策領域向不同「(X4) 地理關係」國家進行政策學習次數的差異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東亞外的亞洲	東亞國家	非亞洲國家	總計	東亞外的亞洲	東亞國家	非亞洲國家	總計	東亞外的亞洲	東亞國家	非亞洲國家	總計	東亞外的亞洲	東亞國家	非亞洲國家	總計
國家數	27	19	153	199	27	19	153	199	27	19	153	199	27	19	153	199
內政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0.19	10.63	1.46	2.17	0.00	3.42	0.43	0.66	0.04	0.84	0.10	0.16	0.22	14.89	1.99	2.98
F 檢定	F=9.887***				F=8.616***				F=11.610***				F=10.114***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東亞 外的 亞洲	東亞 國家	非 亞洲 國家	總 計												
經濟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1.56	45.05	5.20	8.51	0.37	19.89	2.30	3.72	0.15	2.11	0.18	0.36	2.07	67.05	7.69	12.59
	F 檢定	F=20.957***				F=13.349***				F=41.713***				F=19.733***			
教育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0.44	16.58	1.23	2.59	0.04	1.11	0.25	0.31	0.07	4.58	0.44	0.78	0.56	22.26	1.92	3.68
	F 檢定	F=29.604***				F=6.833***				F=35.559***				F=36.845***			
交通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1.81	47.95	3.91	7.83	0.00	7.32	1.54	1.88	0.00	1.42	0.16	0.26	1.81	56.68	5.61	9.97
	F 檢定	F=19.316***				F=6.835***				F=9.571***				F=16.839***			
法務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0.15	7.21	1.20	1.63	0.00	0.89	0.30	0.32	0.07	1.63	0.50	0.55	0.22	9.74	2.00	2.50
	F 檢定	F=7.081***				F=2.251				F=3.273*				F=6.621**			
農業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1.41	49.37	3.41	7.53	0.04	3.89	0.56	0.81	0.07	0.68	0.05	0.12	1.52	53.95	4.03	8.45
	F 檢定	F=30.338***				F=9.456***				F=16.861***				F=28.150***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東亞外的亞洲	東亞國家	非亞洲國家	總計	東亞外的亞洲	東亞國家	非亞洲國家	總計	東亞外的亞洲	東亞國家	非亞洲國家	總計	東亞外的亞洲	東亞國家	非亞洲國家	總計
環保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0.15	12.26	1.87	2.63	0.00	1.32	0.22	0.30	0.11	7.11	0.77	1.29	0.26	20.68	2.86	4.21
	F 檢定	F=9.567***				F=4.994**				F=18.681***				F=12.365***			
衛生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0.56	33.53	4.65	6.85	0.04	2.95	0.44	0.63	0.00	2.37	0.28	0.44	0.59	38.84	5.37	7.92
	F 檢定	F=12.606***				F=7.961***				F=11.890***				F=12.545***			
勞工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0.33	5.05	0.80	1.15	0.07	5.53	1.15	1.42	0.00	0.79	0.05	0.12	0.41	11.37	2.01	2.68
	F 檢定	F=6.314**				F=6.021**				F=22.017***				F=7.102***			
文化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0.07	10.47	0.70	1.55	0.00	1.84	0.25	0.37	0.11	0.74	0.11	0.17	0.19	13.05	1.07	2.09
	F 檢定	F=12.380***				F=17.705***				F=9.494***				F=14.906***			
財政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0.33	9.58	0.82	1.59	0.00	0.16	0.03	0.04	0.00	0.53	0.09	0.12	0.33	10.26	0.95	1.75
	F 檢定	F=41.945***				F=2.721				F=8.231***				F=40.633***			

資料來源：本研究歸納整理。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四、學習對象的選擇和交通方便性（X5）有關？

表 7 顯示，交通方便性也是我國政府選擇政策學習對象的考量，除了法務、農業、環保三個領域的委託研究資料，以及交通、法務的業務與績效報告資料外，其他資料都呈現出我國較常向「不需轉機」就可以抵達之國家蒐集政策資訊進行學習。以經濟政策領域的三種資料加總數據為例，我國向「不需轉機」（共 14 個國家）即可抵達的國家，平均學習次數達 91.07 次，但向「需轉機」國家（共 184 個國家）學習的平均次數只有 6.69 次，兩者達到顯著差異。

另外，若比較各個領域當中三種來源資料可以發現，需轉機與不需轉機地區的差異，在出國報告當中特別明顯，這或許又會和我國公務出國預算、日程時間長短的限制有關，多數機關出國時會排除掉交通比較不便的地區，因為這些地區需要的旅途成本通常會較高、旅程時間較長。至於，委託研究報告與業務績效報告當中所呈現的數據差異就比較小，或許這是因為這兩類資料的來源可以透過網路或委託學術機構取得有關。

總之，本文發現，我國 11 個政策領域的學習對象選擇邏輯，與交通方便性有關，最常向位處「不需轉機」就可以抵達的國家學習。

表 7

各政策領域向不同「(X5) 交通關係」國家進行政策學習次數的差異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不需轉機	需轉機	總計	不需轉機	需轉機	總計	不需轉機	需轉機	總計	不需轉機	需轉機	總計	
國家數	14	184	198	14	184	198	14	184	198	14	184	198	
內政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14.71	1.22	2.17	5.21	0.31	0.66	1.07	0.09	0.16	21	1.62	2.98
	t 檢定	t=2.580*			t=2.184*			t=2.445*			t=2.529*		
經濟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60.00	4.64	8.51	28.50	1.85	3.72	2.57	0.20	0.36	91.07	6.69	12.59
	t 檢定	t=8.037***			t=6.966***			t=10.125***			t=8.007***		
教育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22.71	1.06	2.59	1.57	0.21	0.31	6.5	0.35	0.78	30.79	1.63	3.68
	t 檢定	t=3.010*			t=2.104			t=5.109***			t=3.881**		
交通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65.64	3.45	7.83	11.64	1.15	1.88	1.93	0.14	0.26	79.21	4.74	9.97
	t 檢定	t=2.682*			t=2.592*			t=2.108			t=2.710*		
法務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9.57	1.03	1.63	1.86	0.2	0.32	2.36	0.42	0.55	13.79	1.64	2.5
	t 檢定	t=2.579*			t=1.721			t=1.740			t=2.699*		
農業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64	3.25	7.53	5.21	0.48	0.81	1	0.05	0.12	70.21	3.78	8.45
	t 檢定	t=2.958*			t=2.076			t=2.732*			t=2.906*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不需轉機	需轉機	總計	不需轉機	需轉機	總計	不需轉機	需轉機	總計	不需轉機	需轉機	總計
環保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17.21	1.52	2.63	1.86	0.18	0.3	10.21	0.61	1.29	29.29	2.31	4.21
	t 檢定	t=1.768*			t=1.919			t=3.677**			t=3.234**		
衛生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48.29	3.71	6.85	3.93	0.38	0.63	3.14	0.24	0.44	55.36	4.33	7.92
	t 檢定	t=3.582**			t=2.326*			t=2.692*			t=3.465**		
勞工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6.21	0.77	1.15	8.29	0.91	1.42	1.00	0.05	0.12	15.50	1.72	2.68
	t 檢定	t=3.893***			t=4.866***			t=7.541***			t=4.708***		
文化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14.71	0.55	1.55	2.50	0.21	0.37	1.14	0.10	0.17	18.36	0.86	2.09
	t 檢定	t=6.424***			t=7.486***			t=6.704***			t=7.149***		
財政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12.36	0.78	1.59	0.21	0.03	0.04	0.64	0.08	0.12	13.21	0.89	1.75
	t 檢定	t=11.161***			t=2.821**			t=4.323***			t=10.932***		

資料來源：本研究歸納整理。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五、學習對象的選擇和語言可及性 (X6) 有關？

表 8 顯示，除了文化領域的出國報告書資料之外，其他所有領域的所有資料都顯現我國向不同「語言可及性」國家學習的次數，有

顯著差異。向「語言可及性高（中、日、英語可通）」國家學習的平均次數，高於向「語言可及性低國家」學習的次數。以農業領域的三種加總資料為例，我國向語言可及性高的 112 個國家學習的平均次數是 13.88 次，但向另外 87 個語言可及性較低國家的平均學習次數只有 1.46 次。整合來說，本文發現，我國 11 個政策領域的學習對象選擇邏輯，包含著語言可及性的考量。

表 8

各政策領域向不同「(X6) 語言可及性」國家進行政策學習次數的差異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語言可及高	語言可及低	總計	語言可及高	語言可及低	總計	語言可及高	語言可及低	總計	語言可及高	語言可及低	總計	
國家數	112	87	199	112	87	199	112	87	199	112	87	199	
內政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3.54	0.4	2.17	1.14	0.03	0.66	0.27	0.02	0.16	4.95	0.46	2.98
	t 檢定	t=2.727**			t=2.778**			t=2.859**			t=2.810**		
經濟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13.31	2.33	8.51	6.43	0.23	3.72	0.57	0.09	0.36	20.31	2.66	12.59
	t 檢定	t=2.739**			t=2.880**			t=3.308***			t=2.887**		
教育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3.96	0.82	2.59	0.43	0.15	0.31	1.21	0.24	0.78	5.6	1.21	3.68
	t 檢定	t=2.651**			t=2.053*			t=3.188**			t=3.022**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語言可及高	語言可及低	總計	語言可及高	語言可及低	總計	語言可及高	語言可及低	總計	語言可及高	語言可及低	總計
交通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13.02	1.15	7.83	3.22	0.16	1.88	0.46	0.01	0.26	16.7	1.32	9.97
	t 檢定	t=2.962**			t=3.428***			t=2.787**			t=3.109**		
法務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2.59	0.39	1.63	0.54	0.03	0.32	0.88	0.14	0.55	4	0.56	2.5
	t 檢定	t=2.452*			t=2.808**			t=2.778**			t=2.844**		
農業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12.29	1.39	7.53	1.39	0.06	0.81	0.2	0.01	0.12	13.88	1.46	8.45
	t 檢定	t=3.133**			t=3.131**			t=3.063**			t=3.191**		
環保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4.14	0.68	2.63	0.49	0.05	0.3	2.21	0.09	1.29	6.85	0.82	4.21
	t 檢定	t=2.576*			t=2.295*			t=3.612***			t=2.980**		
衛生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10.94	1.59	6.85	1.08	0.05	0.63	0.75	0.05	0.44	12.77	1.68	7.92
	t 檢定	t=2.875**			t=2.973**			t=2.935**			t=2.939**		
勞工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1.85	0.24	1.15	2.40	0.16	1.42	0.20	0.01	0.12	4.45	0.41	2.68
	t 檢定	t=2.177*			t=2.767**			t=2.552*			t=2.582*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語言可及高	語言可及低	總計	語言可及高	語言可及低	總計	語言可及高	語言可及低	總計	語言可及高	語言可及低	總計
文化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2.53	0.29	1.55	0.63	0.03	0.37	0.25	0.07	0.17	3.41	0.39	209
	t 檢定	t=1.811			t=3.464***			t=2.059*			t=2.163*		
財政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2.38	0.57	1.59	0.07	0.00	0.04	0.19	0.03	0.12	2.64	0.61	1.75
	t 檢定	t=2.701**			t=2.075*			t=2.217*			t=2.8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歸納整理。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六、學習對象的選擇和政府體制 (X7) 是否有關？

分析結果顯示 (表 9)，教育領域、文化領域的出國報告資料顯示，向世界上「專制國家」學習的次數 (教育 10.18 次；文化 10.18 次)，有比向「議會與君主立憲」 (教育 3.14 次；文化 1.41 次) 及「總統與半總統制」 (教育 1.30 次；文化 0.73 次) 的國家多。這個結果有點出乎意料，為何會比較常向專制國家學習？檢視原始資料發現，這兩個領域中具有「學習」相關文字的出國紀錄 (請見附錄表 A)，到「中國大陸」的次數都是最高，為何這兩個領域特別喜歡到中國去學習，值得未來研究深入分析。至於其他 9 個政策領域向國外政府學習時，資料顯示不會因為對象國家政府體制的不同而有差異。

表 9

各政策領域向不同「(X7)體制相近關係」國家進行政策學習次數的差異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專制國家	議會與君主立憲	總統與半總統制	總計	專制國家	議會與君主立憲	總統與半總統制	總計	專制國家	議會與君主立憲	總統與半總統制	總計	專制國家	議會與君主立憲	總統與半總統制	總計	
國家數	11	88	98	197	11	88	98	197	11	88	98	197	11	88	98	197	
內政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3.00	2.72	1.62	2.19	1.00	0.81	0.41	0.62	0.18	0.19	0.12	0.16	4.18	3.72	2.15	2.96
	F 檢定	F=0.37				F=0.45				F=0.25				F=0.39			
經濟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20.91	10.65	5.38	8.60	7.09	4.73	2.08	3.54	0.55	0.38	0.32	0.36	28.55	15.75	7.78	12.50
	F 檢定	F=1.88				F=1.02				F=0.27				F=1.56			
教育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10.18	3.14	1.30	2.61	0.09	0.42	0.19	0.29	1.18	0.99	0.57	0.79	11.45	4.55	2.06	3.70
	F 檢定	F=4.71**				F=1.34				F=0.84				F=3.73*			
交通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17.09	10.86	4.22	7.91	2.91	2.49	1.05	1.80	0.27	0.31	0.21	0.26	20.27	13.66	5.49	9.96
	F 檢定	F=1.45				F=1.08				F=0.12				F=1.35			
法務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4.55	1.57	1.39	1.64	0.09	0.53	0.11	0.30	0.27	0.75	0.32	0.51	4.91	2.85	1.82	2.45
	F 檢定	F=0.97				F=2.22				F=1.15				F=0.64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專制國家	議會與君主立憲	總統與半總統制	總計	專制國家	議會與君主立憲	總統與半總統制	總計	專制國家	議會與君主立憲	總統與半總統制	總計	專制國家	議會與君主立憲	總統與半總統制	總計
農業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19.27	9.50	4.59	7.60	0.73	1.01	0.48	0.73	0.27	0.16	0.06	0.12	20.27	10.67	5.13	8.45
	F 檢定	F=1.71				F=0.62				F=1.55				F=1.54			
環保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7.00	2.84	2.00	2.65	0.36	0.32	0.22	0.27	1.45	1.57	0.84	1.20	8.82	4.73	3.06	4.13
	F 檢定	F=1.09				F=0.11				F=0.60				F=0.73			
衛生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14.00	8.31	4.88	6.92	0.73	0.77	0.37	0.57	0.64	0.52	0.29	0.41	15.36	9.60	5.53	7.90
	F 檢定	F=0.82				F=0.55				F=0.45				F=0.76			
勞工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1.18	1.27	1.05	1.16	0.64	1.84	0.96	1.34	0.09	0.15	0.08	0.11	1.91	3.26	2.09	2.60
	F 檢定	F=0.04				F=0.65				F=0.39				F=0.28			
文化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10.18	1.41	0.73	1.56	0.55	0.51	0.21	0.37	0.18	0.26	0.09	0.17	10.91	2.18	1.04	2.10
	F 檢定	F=6.09**				F=1.45				F=1.73				F=5.11			
財政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2.82	1.74	1.36	1.61	0.09	0.03	0.04	0.04	0.18	0.14	0.10	0.12	3.09	1.91	1.50	1.77
	F 檢定	F=0.52				F=0.26				F=0.20				F=0.52			

資料來源：本研究歸納整理。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七、學習對象的選擇和區域主義影響（X8）有關？

分析結果顯示（表 10），比較明顯會向區域主義對象國家學習的政策領域包含經濟、教育、農業、衛生、與財政五個領域，這些領域各自會有三個平均數在區域與非區域國家之間有顯著差異，以財政領域為例，出國報告顯示向區域聯盟國家學的平均次數（8.77 次）遠高於非區域聯盟國家（1.09 次），財政領域的業務與績效報告、三種資料加總也是如此狀況。至於各種資料都顯示，區域聯盟國家與非區域聯盟國家，被我國學習平均次數沒有顯著差異的有法務領域，只有一種資料呈現有顯著差異的，則是內政、環保、與勞工領域。當然，上述結果也不排除是因為本文對於區域聯盟的界定是東協、南向國家所致，當以其他方式進行「區域」的界定时，會不會有其他的結果？值得後續研究引入更完整的區域主義觀點之後分析討論。

表 10

各政策領域向不同「(X8) 區域主義關係」國家進行政策學習次數的差異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非區域聯盟	區域聯盟	總計	非區域聯盟	區域聯盟	總計	非區域聯盟	區域聯盟	總計	非區域聯盟	區域聯盟	總計
國家數	186	13	199	186	13	199	186	13	199	186	13	199
內政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1.87	6.38	2.17	0.60	1.46	0.66	0.12	0.69	0.16	2.60	8.54	2.98
t 檢定	t=-1.715			t=-0.934			t=-2.950**			t=-1.620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非區域聯盟	區域聯盟	總計	非區域聯盟	區域聯盟	總計	非區域聯盟	區域聯盟	總計	非區域聯盟	區域聯盟	總計
經濟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7.10	28.77	8.51	3.28	10.00	3.72	0.25	2.00	0.36	10.62	40.77	12.59
	t 檢定	t=-2.691**			t=-1.533			t=-6.452***			t=-2.441*		
教育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2.13	9.15	2.59	0.27	0.85	0.31	0.49	5.00	0.78	2.89	15.00	3.68
	t 檢定	t=-2.622**			t=-1.912			t=-7.354***			t=-3.754***		
交通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6.35	28.92	7.83	1.77	3.46	1.88	0.22	0.92	0.26	8.34	33.31	9.97
	t 檢定	t=-2.470*			t=-0.813			t=-1.942			t=-2.203*		
法務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1.48	3.69	1.63	0.30	0.54	0.32	0.54	0.69	0.55	2.33	4.92	2.50
	t 檢定	t=-1.079			t=-0.578			t=-0.245			t=-0.934		
農業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5.77	32.62	7.53	0.73	2.00	0.81	0.10	0.38	0.12	6.60	35.00	8.45
	t 檢定	t=-3.423***			t=-1.293			t=-2.092*			-3.225***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非區域聯盟	區域聯盟	總計	非區域聯盟	區域聯盟	總計	非區域聯盟	區域聯盟	總計	非區域聯盟	區域聯盟	總計
環 保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2.42	5.54	2.63	0.29	0.38	0.30	0.99	5.46	1.29	3.71	11.38	4.21
	t 檢定	t=-1.014			t=-0.212			t=-3.348***			t=-1.654		
衛 生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5.81	21.77	6.85	0.55	1.69	0.63	0.37	1.54	0.44	6.73	25.00	7.92
	t 檢定	t=-2.154*			t=-1.420			t=-2.138*			t=-2.122*		
勞 工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0.98	3.54	1.15	1.35	2.46	1.42	0.08	0.69	0.12	2.40	6.69	2.68
	t 檢定	t=-1.720			t=-0.672			t=-4.370***			t=-1.352		
文 化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1.45	2.92	1.55	0.32	1.15	0.37	0.15	0.54	0.17	1.91	4.62	2.09
	t 檢定	t=-0.588			t=-2.371*			t=-2.232*			t=-0.955		
財 政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1.09	8.77	1.59	0.04	0.00	0.04	0.09	0.62	0.12	1.22	9.38	1.75
	t 檢定	t=-6.116***			t=0.616			t=-3.918***			t=-6.016***		

資料來源：本研究歸納整理。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八、學習對象的選擇受知識霸權（X10）影響？

資料顯示（表 11），我國學習對象的選擇和知識霸權有關，政策學習對象集中在知識霸權國家。以內政領域為例，三種資料加總後，向知識霸權國家學習的平均次數是 48.43 次，但向非知識霸權國家學習的平均次數僅有 1.33 次。

表 11

各政策領域向不同「(X10) 知識霸權」狀況國家進行政策學習次數的差異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非知識霸權	知識霸權	總計	非知識霸權	知識霸權	總計	非知識霸權	知識霸權	總計	非知識霸權	知識霸權	總計	
國家數	192	7	199	192	7	199	192	7	199	192	7	199	
內政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0.97	34.86	2.17	0.29	10.86	0.66	0.07	2.71	0.16	1.33	48.43	2.98
	t 檢定	t=-12.968***			t=-10.768***			t=-14.304***			t=-12.937***		
經濟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5.16	100.43	8.51	1.67	60.00	3.72	0.24	3.57	0.36	7.07	164.00	12.59
	t 檢定	t=-11.009***			t=-13.857***			t=-10.284***			t=-12.500***		
教育	被學習 次數 (X1) 平均	1.84	23.14	2.59	0.23	2.43	0.31	0.52	8.14	0.78	2.58	33.71	3.68
	t 檢定	t=-6.405***			t=-5.826***			t=-10.126***			t=-7.997***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非知識霸權	知識霸權	總計	非知識霸權	知識霸權	總計	非知識霸權	知識霸權	總計	非知識霸權	知識霸權	總計
交通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4.24	106.29	7.83	0.90	29.00	1.88	0.10	4.71	0.26	5.23	140.00	9.97
	t 檢定	t=-10.108***			t=-14.486***			t=-12.529***			t=-11.214***		
法務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0.83	23.57	1.63	0.10	6.29	0.32	0.27	8.43	0.55	1.19	38.29	2.50
	t 檢定	t=-10.215***			t=-18.641***			t=-14.241***			t=-14.068***		
農業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4.43	92.57	7.53	0.38	12.57	0.81	0.06	1.57	0.12	4.87	106.71	8.45
	t 檢定	t=-9.995***			t=-12.144***			t=-9.891***			t=-10.489***		
環保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1.49	33.71	2.63	0.13	5.00	0.30	0.73	16.43	1.29	2.35	55.14	4.21
	t 檢定	t=-9.386***			t=-10.051***			t=-10.740***			t=-10.529***		
衛生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3.85	89.14	6.85	0.28	10.14	0.63	0.23	6.29	0.44	4.36	105.57	7.92
	t 檢定	t=-10.646***			t=-12.006***			t=-9.987***			t=-11.010***		

		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			業務與績效報告			三種資料加總		
		非知識霸權	知識霸權	總計	非知識霸權	知識霸權	總計	非知識霸權	知識霸權	總計	非知識霸權	知識霸權	總計
勞工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0.55	17.43	1.15	0.63	23.14	1.42	0.05	1.86	0.12	1.23	42.43	2.68
	t 檢定	t=-10.470***			t=-14.632***			t=-11.954***			t=-13.252***		
文化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0.99	16.86	1.55	0.22	4.57	0.37	0.09	2.43	0.17	1.30	23.86	2.09
	t 檢定	t=-5.019***			t=-11.883***			t=-13.631***			t=-6.543***		
財政	被學習次數 (X1) 平均	1.30	9.57	1.59	0.01	0.86	0.04	0.06	1.71	0.12	1.38	12.14	1.75
	t 檢定	t=-4.754***			t=-11.812***			t=-11.251***			t=-5.897***		

資料來源：本研究歸納整理。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九、學習對象選擇與殖民印象 (X9)、與中國的紐帶關係 (X11) 有關？

最後兩個可能影響我國學習對象選擇的因素，包含過去歷史上的殖民印象，以及長期與中國因為既歷史鑲嵌、語言與文化相近、又常受政治情勢牽引而產生之隱晦關係，由於這兩個因素所涉及的對象國家只有日本、美國、及中國三個國家，國家數量很少，無法進行平均數比較，因此本研究以次數分布的方式，進行主觀的判斷。

依據資料結果（請見本文附錄表 A），本文認為，在殖民與霸權記憶部分，所有政策領域的前三名學習對象都有美國或日本，尤其是環保、交通、內政、法務、農業、經濟、勞動、與衛福，日本與美國

都分占被學習次數的前兩名，顯示殖民或霸權印象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我國在政策學習對象上的選擇。至於對中國的學習狀況，除了勞動、財政領域之外，其他九個政策領域對中國學習的次數都是前四名，依此來看，我國向中國的政策學習，在近年中國大陸現代化的趨勢，加上歷史鑲嵌、文化與語言相近的優勢影響下，即使近年兩岸情勢的負向變化，長期累積下來還是出現不少政策上的交流，集體層次（未細分不同執政黨）的數據顯示，在政策學習動作上，中國的紐帶關係影響是存在的。

十、小結：組織記憶牽引下多向霸權、友好、相近、資訊易得者學

彙整前面 11 大政策領域的分析結果，本文發現：不論是在哪一個政策領域，我國政策學習對象選擇背後的邏輯，似乎都被國家發展歷史與組織習慣牽引，學習資訊多數取自政治友好（支持 H1）、經濟鑲嵌（支持 H2）、資訊鄰近者（支持 H3, H4, H5），背後的機制包含按照過去互動習慣，以及容易取得資訊為優先的考量。除此之外，區域主義（部分支持 H7）、殖民印象（支持 H8）、知識霸權（支持 H9）、與中國紐帶關係之力量（部分支持 H10），也都影響了我國的政策學習行為，比較像是一個歷史制度主義下的效果。綜整各政策領域在各變數之分析結果，請見表 12（表內標號意涵/判斷標準請見該表之註）。

至於政策領域差異部分，本文認為，各政策領域的政策學習網絡差異不明顯，稍顯特殊的只有法務領域較不會向區域國家尋求學習資訊，而勞工與財政領域使用來自中國之政策資訊的比例較低，其餘領域的顯著變數大同小異，這或許和我國文官體系都是透過相同的模式運作有關，是我國全國一致之政府運作模式下的制度化結果，一個制度制約環境下的習慣性產物。

表 12

假設驗證結果：各政策領域的國際政策學習對象偏好（顏色越深表越支持假設）

政策領域	概念 變數 假設	友好度	資訊可得者			組織特徵同質	制度主義					
			(經濟)位置相近性	地理鄰近性			文化同質性	我國特殊地緣政治與歷史發展脈絡影響				
				向地理鄰近者學 (X4/H3)	向交通方便者學 (X5/H4)			向語言可及高者學 (X6/H5)	向體制相近者學 (X7/H6)	向區域國家學 (X8/H7)	向知識霸權學 (X10/H9)	向殖民霸權學 (X9/H8)
1.內政	支持(4)	支持(4)	支持(4)	支持(4)	支持(4)	不支持	微幅支持(1)	支持(4)	支持	部分支持		
2.經濟	支持(4)	支持(4)	支持(4)	支持(4)	支持(4)	不支持	部分支持(3)	支持(4)	支持	支持		
3.教育	支持(4)	支持(4)	支持(4)	部分支持(3)	支持(4)	不支持	部分支持(3)	支持(4)	支持	支持		
4.交通	支持(4)	支持(4)	支持(4)	部分支持(3)	支持(4)	不支持	部分支持(2)	支持(4)	支持	支持		
5.法務	支持(4)	支持(4)	支持(4)	部分支持(2)	支持(4)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4)	支持	支持		
6.農業	支持(4)	支持(4)	支持(4)	部分支持(3)	支持(4)	不支持	部分支持(3)	支持(4)	支持	支持		
7.環保	支持(4)	支持(4)	支持(4)	部分支持(3)	支持(4)	不支持	微幅支持(1)	支持(4)	支持	支持		
8.衛生	支持(4)	支持(4)	支持(4)	支持(4)	支持(4)	不支持	部分支持(3)	支持(4)	支持	支持		
9.勞工	支持(4)	支持(4)	支持(4)	支持(4)	支持(4)	不支持	微幅支持(1)	支持(4)	支持	不支持		
10.文化	部分支持(3)	支持(4)	支持(4)	支持(4)	部分支持(3)	不支持	部分支持(2)	支持(4)	部分支持	支持		
11.財政	支持(4)	支持(4)	部分支持(3)	支持(4)	支持(4)	不支持	部分支持(3)	支持(4)	部分支持	不支持		

註：H1-H7, H9 括弧內為四種資料（績效業務報告、出國報告、研究報告、前三種資料加總）中有顯著統計差異的數量，若四種資料都有顯著差異，則標示為「支持（4）」假設，2-3 類資料有顯著差異則標為「部分支持（2/3）」假設、只有 1 類資料則顯示「微幅支持（1）」假設，沒有資料有顯著差異則標示為「不支持」。

H8 為若日本與美國都在學習對象的前三名，則標示為「支持」，若只有美日其中一個國家在前三名，則標示為「部分支持」；H10 為中國若在學習對象的前三名，則標示為「支持」，若在第四、五名，則標示為「部分支持」，若是在第六名以後，則標示為「不支持」。

資料來源：本研究歸納整理。

伍、結論

有限資源下，政策學習資訊蒐集者不應是盲劍客，不該讓政策學習資訊的出現是一種隨機的結果，背後應該要有一些策略選擇機制，而且每一個政策領域應有專屬的學習網絡，術業有專攻，世上不太可能有某一個國家可以在任何政策領域上，都可以當我國的觀摩對象，換言之，不同政策領域的政策學習對象應不同。可惜的是，對於上述現象的理論歸納與實務現況分析，都相當缺乏。

一、發現與討論

本文的目的是呈現我國 11 個政策領域機關的政策學習對象之選擇的現況，並結合理論來推測背後的選擇機制，最終提出實務建議。本文最終發現以下幾點：

首先，文獻中對政策學習對象選擇機制的討論，散布在不同領域，且大多只停留在概念層次上的討論，沒有系統性實證分析。透過文獻的檢閱，本文認為可將這些概念區分成依照空間、時間、資訊特徵、策略、理性程度幾種，而每一個學習對象都可能擁有一個以上的特徵，每個地區的學習行為，也會因為那個地區的政治、經濟或社會發展脈絡，而有個殊性的影響因素（請見表 1）。

第二，資料分析後發現，多數政策領域之政策學習資訊選擇的考量與政治友好度、經濟鑲嵌度、資訊可及度有關，另外也有地區政治與歷史背景牽引痕跡（例如知識霸權、殖民霸權、與中國的紐帶關係的影響），整體來說，有 Freeman（2007）所描繪之制度主義途徑下，組織既定程序與成員概念認知習慣之展現，或 Simon（1997）認為資

訊蒐集行為受到「注意幅度」與「習慣領域」限制的狀況，尤其各政策領域之主責機關的運作方式都相當類似，各領域的政策學習地圖差異不明顯，更加深了這個途徑的解釋力。至於微幅顯露個殊性的政策領域，包含法務領域沒有特別向區域國家取得學習資訊，勞工與財政領域向中國取得政策資訊的比例較低的現象，背後是否隱藏著哪些機關特徵或政策議題特徵所產生的效果？例如在法務議題上，因為東南亞國家的法治機制發展比較晚，相對於我國有比較大的差距，或是我國屬大陸法系，但新加坡、馬來西亞深受英美普通法系影響，印尼、菲律賓則混合了歐洲法、宗教法...等，區域國家與我國有較多的差異，因此可以歸因到文獻上所指因體制差異而產生的資料適合度考量上；至於勞工、財政兩議題相對較少採用中國大陸政策資訊的原因，是否是因為中國大陸在勞工管制實務上有較多依產業、地區的變化性，而我國則是有全國一致的勞工規範有關，同樣是歸納到資料的適合度特徵上；或是這三個領域的差異，只是單純地因為本文測量偏誤或是隨機誤差而產生？由於本文所仰賴的資料有限，加上過去相關文獻幾乎沒有這方面的討論¹³，難據以作為這個現象之解釋依據，只期待未來能有研究針對這個狀況進行政策領域區分後，引入其他學術領域的文獻進行假設與驗證。

第三，在地發展脈絡所影響的資訊行為確實存在，以我國來說，幾乎所有的政策領域都延續過去被殖民經驗、被霸權國家領導的印

13. 比較接近的文獻如 Mallinson (2021) 所做的後設分析，該文分析幾百篇相關文獻後發現，府際間的政策擴散現象（包含相互學習、競爭等原因），可以將政策類型區分成管制政策（Regulatory Policy）、道德政策（Morality Policy）、與治理政策（Governance Policy），而其中管制政策較會因內部因素的影響而（被）擴散，例如黨派類型、公民自由主義特徵等，而道德性政策較易受到外部力量驅動，例如鄰近州的採用決定、其他採用州與自身之意識形態距離等，至於治理政策則有點像道德政策，只是影響程度較不明顯。

象，經常性地向美國、日本取經。此外，從清朝後期崇尚西學的習慣（外國的月亮比較圓）的思維，也讓傳統被視為「學術霸權」的國家，持續地扮演我國各政策領域的資訊提供者。本文認為，這些在地脈絡因素的存在，或許也是導致了前面第二點發現組織現有習慣或資訊可及因素具影響力的原因，因為在國際政治與軍事環境的框架下，我國資訊行為只能用最省力、最可行的方式來進行，實在沒有太多選擇來源，及與外國政府進行政策對話的自由度。

綜上，本文認為可以用「我國受地緣政治、歷史與組織習慣影響，常向相近性高、容易取得資訊與對話的對象學習」這一句話來形容我國的跨國政策學習行為，呼應了 Stone（1999）認為「心理相似性」，或 Lee 與 van de Meene（2012）稱「文化相似性」特徵在政策學習對象選擇上具影響力的觀點，但本文更進一步認為，我國在「相似性」現象背後，和西方文獻至少有兩個差異。首先，不包含組織結構層面的相似性，因為至少從制度分類的分析結果顯示，我國並未特別向和我國體制上較相近的總統制／半總統制國家學習；第二，西方文獻在相似性這個因素的演繹上，主要是推論自相似性高地區之資訊會有較高程度的當地適合性，仍是比較接近資訊可及與品質的考量，但「相似性」對我國的意涵，同時包含著過去歷史所產生之國家間紐帶關係的影響，更深層的主因不是 Rose（2005）所說的「隨機亂看」或是「策略性的選擇」結果，而是我國的被殖民經驗、語言弱勢等因素加上地緣情勢綜合影響下，制度主義下「注意力習慣」的產物。總之，若結合我國的歷史、語言與地緣情境後可以發現，這個西方文獻較少觸及的視角，對我國政策學習的實務影響，是明顯的。

本文的發現也帶出另一個西方文獻忽略掉的視角，那就是不同影響因素之間，其實隱藏著「共線性」的狀況，例如資訊可得的程

度，其實與文化或心理的相近性因素有著重疊的可能性；而文化或心理是否相近，或是政治是否友好、經濟是否鑲嵌，從制度主義的角度來看，又是歷史或是地緣政治的延續，並且和地理鄰近程度同時產生效果。這也就解釋為何本文會說，依過去文獻所歸納出來的因素（請見表 1），或許只是來自不同領域作者在自己所關切之視角上的強調而已，回應 Mallinson（2021）針對數百篇文獻進行後設分析（meta-analysis）後發現，府際間政策影響機制出現了不一致結論的原因。以本文也有使用的「相近性」為例，該文發現有 41% 的研究認為地理鄰近性會正向影響，但也有 22% 的研究則發現不顯著但為負向，而意識型態相近性的影響，有 30% 的文獻發現不顯著但為正向，但也有 61% 的文獻發現負向顯著。或許背後的原因，就只是概念與操作定義的混亂、重疊。針對這一點，Gilardi（2016, p. 12）有類似的批判，同樣都是宣稱在操作化「政策學習」，使用的指標卻是五花八門，例如地理鄰近性、是否參與共同組織、結構相似性、相類似政策採用數，雙方貿易量...等都有文獻使用，然後各自進行結論時，都忽略自身「測量」所可能產生的偏誤，最終的結果當然就是一個結論分歧的現況。

總之，在政策學習這個主題上，或甚至更寬廣的政策擴散議題上，文獻之間的對話、比較，是累積知識的基礎性工作，而要做到這一點，每篇文獻的概念內容與範圍定義之釐清是基本工作，例如本文從政策擴散中拆解出政策學習，然後區分政策學習中的資訊蒐集、應用等不同階段，再以完整的紀錄作分析，如此才能逐步地建立起完整的、一致的理論知識。

二、政策建議

本文發現我國在政策學習初始的資訊取得策略上具有 Freeman (2007) 所描繪之制度主義特徵，但因為本文的實證分析僅是描述性的，無法評斷目前的政策學習所得資訊之品質，例如向知識霸權取得的政策經驗資訊之品質就不好嗎？本文無法做這樣的評斷，另外，本文也是橫斷面的資料分析，無法得知制度主義當中歷史變遷所產生的縱貫影響。但不管如何，本文認為，各種政策學習資訊的蒐集行為完成後，機關內部進行資訊篩選、分析工作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是重要的，因為，一個和政策學習主題鑲嵌的學界共識是，向外部學習後能否真正獲得正向成果，取決於自身機關的能力以及將新知識融入現有體系、專業結構和後續執行的努力 (Neij & Heiskanen, 2021)，若機關內部對於資訊品質判斷的能力不足，很容易如 Dolowitz 與 Marsh (2000) 指出的不完整或錯誤資訊，或蘇偉業 (2017) 所稱的沒有正確解讀學習資訊，而導致政策學習的失敗。因此，為了提升政府機關在政策學習這個政策過程途徑的運作品質，本研究建議各機關應該建置政策學習資訊的檢視機制，例如資訊來源的可信度、資訊產生的時間點 (是否過舊)、資訊蒐集的背景與我國的相似性 (例如國外某政策實施時的社會經濟環境條件狀況) ... 等，透過此機制進行分析後再進行決策，避免盲目學習不該學習之個案，或因只學習一半而導致錯誤的狀況。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文雖然在實證上已經盡可能蒐集所有政府官方文書進行分析，但仍無法迴避的幾個限制，包括：(1) 分析之文字資料來源的信度、效度上皆有侷限，例如僅討論向外國政府機關學習的經驗，未

包含向國際組織、公民社會團體或甚至企業學習的經驗分析；學習者未包含地方政府；用來進行文字分析的委託研究報告之主撰者是研究機構而非政府機關本身，兩者的資訊蒐集思維不一定相同；資料分析的「年度」範圍有限（有些只有兩年）。上述問題都會限制了對我國政府機關在政策學習行為全貌的理解；（2）缺乏「結果變數」的分析。由於規範性觀點推論認為，若較少依政策領域個殊性去向該領域專業者學習，政策學習效果將受制於資訊多樣性與品質而降低，但因為本研究缺乏結果變數的觀察（例如政策學習之成果指標），各政策領域是否因為學習對象未篩選，而產生哪些不好的政策學習失敗現象，難以論斷；（3）政策學習有時候並不會記錄在「文字記錄」當中，有時候是一種啟發，而這樣的學習經驗並未在本研究的分析範圍中；（4）本文僅針對表 1 中的部分概念進行驗證，許多變數因為無法操作化而遺漏，尤其是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下的指標更是缺乏，導致本文雖然有看到制度主義的遺跡，有看到本文所分析之幾個變數之間的重疊狀況，但無法依此推論認為制度主義的影響力比另外兩種認識論途徑大，或是彼此之間的影響力差異為何，因為本文根本沒有納入全部變數；（5）許多政府機關的學習其實起始者還是「個人」，例如某位政府首長個人的資訊認識，再帶領該機關往某些國家進行學習，而個人層次的分析，在本研究以組織為層次的討論當中是被忽略的；（6）許多變數有不同編碼方式的可能，例如經濟關係中的貿易量應該要達到多少可以稱為位置相近？區域主義是否應該包含其他國家組合（如 APEC 國家）？「東亞」指的是哪些國家？或許本文有些分析的結果是因為編碼方式的選擇而產生。

總之，政策學習領域的研究，不應該只有政策學習個案的過程分析，或是個案的擴散分析，Rose（1993）歸納之各種政策學習要發生

之前，必須先出現的一些資訊行為（包含資訊的蒐集、分析、應用）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另外，影響資訊行為的不同變數同時發生時，是如何共同產生效果（例如地理鄰近與文化相近、體制相近與友好度如何同時作用）？理性與制度主義下的政策學習資訊行為之外，政治因素如何影響資訊過程？政治因素如何影響政策學習或創新擴散採用？本文新觀察到的地緣政治或歷史特徵所產生的影響方式，就政策學習理論的觀點，該如何解釋？每一個特定政策領域（交通、法務、環保...等），究竟是因為該領域的哪一種特徵而產生特定效果？本文僅是一個初探的描述性研究，無法馬上回答上述問題，但這些都是以往公共政策研究領域比較少碰觸的一塊，建議未來繼續關注，尤其是本文初步描述的發現或推測，都需要有更多有信、效度的資料進行重複性驗證，最終才能為政策學習現象帶來更堅韌的理論。

參考文獻

- 石之瑜、包淳亮 (2022)。在臺灣研究中國／大陸：知識政治與政治知識。《**展望與探索**》，10 (10)，34-55。 [Shih, C.-Y., & Pao, C.-L. (2022). Mainland China studies in Taiwan: Knowledge politics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Prospect & Exploration*, 10(10), 34-55.]
- 余宗翰 (2018)。希望台灣能學習英國的綠能經驗，蔡英文可能忽略的台英差距。《**Knowing**》，9月21日。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x13Rlr> [Yu, Z.-H. (2018). Xiwang taiwan neng xuexi yingguo de luneng jingyan, Caiyingwen keneng hulue de taiying chaju. *Knowing*, September 21.]
- 吳定 (2017)。《**公共政策**》(二版)。五南。 [Wu, D. (2017). *Public policy* (2nd ed.). Wu-Nan Book Inc.]
- 吳思緯 (2022)。《**東亞國家之政治體制選擇偏好：一般公民、政治菁英與地緣政治面向之分析**》〔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Wu, S.-W. (2022). *Preferences of political regime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citizens, political elites and geopolitic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李仲彬 (2010)。影響全球電子治理發展的因素：以政策擴散理論為基礎的分析。《**公共行政學報**》，(36)，39-89。 [Lee, C.-P. (2010). Factors affecting global e-governance development: An application of policy diffusion theory.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6), 39-89.]
- 李仲彬 (2013)。影響地方政府創新產出量的因素。《**東吳政治學報**》，31 (1)，105-160。 [Lee, C.-P. (2013). Factors affecting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1), 105-160.]

李仲彬 (2021)。政府資訊行為：政策學習研究的遺失環節。五南。
[Lee, C.-P. (2021). *Government information behavior: A missing link of policy learning study*. Wu- Nan Book Inc.]

李明洋 (2015)。台灣教育的悲哀：看到外國的就想抄，怎麼「翻轉」
都沒用。商業周刊，3月23日。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careers/blog/11541 [Li, M.-Y. (2015). Taiwan jiaoyu de beiai: Kan dao waiguo de jiu xiang chao, zen me 'fanzhuan' du mei yong. *Business Weekly*, March 23.]

卓恒瑾 (2023)。全球化對臺灣幼兒教育政策的影響－以托幼整合為例。學校行政雙月刊，(146)，218-234。[Cho, H.-C. (2023). The case of globalization on education policy in Taiwan: The integration policy for childcare. *School Administration*, (146), 218-234.]

孟繁勳、王俊元、詹永茂 (2020)。影響政策學習效果因素之研究：臺灣地方政府成立騎警隊之分析。東吳政治學報，38(1)，57-112。[Meng, F.-S., Wang, C.-Y., Zhan, Y.-M. (2020). A study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ect of policy learning: An analysi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ice mounted unit in Taiwan local government.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8(1), 57-112.]

施正鋒、吳珮瑛 (2009)。台灣臺灣的學術殖民主義與原住民的知識主權。台灣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5)，1-24。[Shih, C.-F. & Wu, P.-I. (2009). Academic colonialism in Taiwan and the intellectual sovereignty of indigenous peoples. *Taiwan Indigenous Studies*

Review, (5), 1-24.]

- 侯元鈞 (2005)。黃皮膚白面具—西方課程學術移植的後殖民反思。
課程與教學, 8(4), 153-164。[Hou, Y.-C. (2005). Yellow skins, white masks—Reflecting the transplantation of western curricular schola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ism. *Curriculum & Instruction Quarterly*, 8(4), 153-164.]
- 柯于璋 (2012)。政策移植與移植政策評估指標之建立—結合政策過程與知識應用之雙元演化觀點。*公共行政學報*, (43), 63-90。
[Ke, Y.-C. (2012). The study of policy transf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transfer policies: A dual evolutionary prospect of integrating policy process and knowledge utiliz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3), 63-90.]
- 柯于璋 (2016)。我國「閱讀起步走」政策創新與擴散之研究—政策知識管理的研究途徑。*公共行政學報*, (51), 35-67。[Ke, Y.-C. (2016). A study of policy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of the bookstart program in Taiwan: A policy knowledge management approach.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51), 35-67.]
- 孫國祥 (2003)。新區域主義及其對台灣臺灣發展的影響。*全球政治評論*, (3), 83-113。[Sun, K.-S. (2003). New regionalism impact on Taiwan's development.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3), 83-113.]
- 章五奇 (2010)。從後殖民觀點分析國小社會領域教科書中「全球關聯」內容。*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報*, 27(2), 103-134。[Chang, W.-C. (2010).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on the content of "Textbooks" in social fields associated with globalization. *Educational Journal of NHCUE*, 27(2), 103-134.]

陳明莉 (2003)。臺灣學術場域的知識生產、傳播與消費：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出版分析。《教育與社會研究》，(5)，1-46。[Chen, M.-L. (2003). The production, dissemin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Taiwanese academic field: An analysis of academic pub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Formosan Education and Society*, (5), 1-46.]

陳鴻瑜 (2021)。評析南向政策的倡議與成效。《展望與探索》，19(4)，41-64。[Chen, H.-Y. (2021). A review of Taiwan's southward policy. *Prospect & Exploration*, 19(4), 41-64.]

彭俊亨、吳政峰、王俊元 (2010)。政策擴散下的創新治理：台灣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之經驗與啟發。《國家與社會》，(8)，99-155。[Peng, C.-H., Wu, C.-F., & Wang, C.-Y. (2010). Innovation governance in policy diffusion: Experience and lessons in the case of National Taiwan Craf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State and society*, (8), 99-155.]

黃東益 (2004)。全球治理下政府知識管理的新面向：府際政策學習。《國家政策季刊》，3(1)，135-153。[Huang, T.-Y. (2004). The new dimension of governmental knowledge management under global governance: Policy learning among governments. *National Policy Quarterly*, 3(1), 135-153.]

黃東煬 (2008)。我國南向政策成效的回顧與展望。《展望與探索》，6(12)，41-60。[Hwang, D.-Y. (2008).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southward policy achievement. *Prospect & Exploration*, 6(12), 41-60.]

傅岳邦 (2017)。我國永續政策的學習與移植。《警專論壇》，(23)，209-

- 221。[Fu, Y.-B. (2017). Learning and transfer of sustainable policy. *Police College Forum*, (23), 209-221.]
- 楊昊 (2015)。導論。載於楊昊 (編), **東亞的理論與理論的東亞** (第一章)。洪葉文化出版。[Yang, H. (2015). Introduction. In Yang, H. (Ed.), *Theory of East Asia and East Asia of Theory* (Chapter 1). Hungyeh Inc.].
- 楊昊 (2017)。檢視臺灣的新南向政策：議程、網絡與挑戰。**問題與研究**, 56 (1), 123-143。[Yang, H. (2017). Revisiting Taiwan's new southbound policy: Agenda, networks and challenges. *Issues & Studies*, 56(1), 123-143.]
- 廖興中 (2020)。臺灣閱讀起步走計畫政策擴散相關因素之空間分析。**民主與治理**, 7 (1), 89-116。[Liao, H.-C. (2020). The spatial analysis on the policy diffusion factors of the bookstart program in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7(1), 89-116.]
- 蔡東杰 (2013)。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五南。[Tsai, T.-C. (201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Wu-Nan Book Inc.]
- 鄭志成 (2015)。臺灣社會理論知識的雙重殖民處境—兩岸社會理論專書譯作不對等流動的省思。**庶民文化研究**, (12), 1-46。[Jeng, C.-C. (2015). The situation of social theory in Taiwan: A double colonized perspective. *Journal for Studies of Everyday Life*, (12), 1-46.]
- 鄭瑞耀 (2015)。形塑中的亞洲國際關係型態：複雜區域體系。載於楊昊 (編), **東亞的理論與理論的東亞** (第二章)。洪葉文化出版。[Zheng, R.-Y. (2015). The shaping of Asi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lex regional system. In Yang, H. (Ed.), *Theory of East Asia and East Asia of Theory* (Chapter 2). Hungyeh Inc.]

蕭全政(2000)。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意義與理論基礎。《政治科學論叢》，(13)，1-26。[Shiau, C.-J. (2000).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in Taiwan.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3), 1-26.]

蕭全政(2011)。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台灣臺灣的角色。《政治科學論叢》，(14)，201-222。[Shiau, C.-J. (2011).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the role of Taiwan.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4), 201-222.]

謝國雄(2011)。百年來的社會學：斷裂、移植與深耕。載於王汎森等(編)，*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頁349-385)。政治大學與聯經聯合出版。[Shie, G.-S. (2011). Sociology over the past century: Rupture, transplantation and deep cultivation. In F.-S. Wang et al. (Eds.),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cademic development* (pp. 349-385). Chenchi University and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蘇偉業(2017)。西方模型移植還是扭曲性傳譯？中國行政改革的政策學習過程。《中國大陸研究》，60(4)，1-24。[So, W.-Y. (2017). Transfer to western model or distorted translation? The policy learning process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s in China. *Mainland China Studies*, 60(4), 1-24.]

蘇翊豪(2016)。新南向政策的兩岸變數－臺灣前三波南向政策之策略比較。《清流雙月刊》，(5)，50-52。[So, Y.-H. (2016). Cross-Strait factors in Taiwan's new southbound policy: A comparison of the strategies

- from the first three waves of southbound policies. *Qingliu Bimonthly*, (5), 50-52.]
- Berry, F. S. (2023). Finding common ground: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acros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56(3), 1-10.
- Berry, F. S., & Berry, W. D. (2007).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models in policy research. In C. M. Weible & P. A. Sabatier (Eds.),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pp. 223-260). Westview Press.
- Cao, X. (2010). Networks as channels of policy diffusion: Explaining worldwide changes in capital taxation, 1998-2006.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4(3), 823-854.
- Choo, C.-W. (2001). Environmental scanning as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formation Research*, 7(1), 1-14.
- Dobbin, F., Simmons, B., & Garrett, G. (2007).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public policies: Social construction, coercion, competition, or learning?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449-72.
- Dolowitz, D. P., & Marsh, D. (2000). Learning from abroad: The role of policy transfer in contemporary policy-making. *Governance*, 13(1), 5-23.
- Einstein, K. L., Glick, D. M., & Palmer, M. (2019). City learning: Evidence of policy information diffusion from a survey of U.S. mayor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72(1), 243-258.
- Freeman, R. (2007). Epistemological bricolage: How practitioners make sense of learning.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39(4), 476-496.
- Fuglister, K. (2012). Where does diffusion take place? The role of

-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for policy diffusion in Switzerland.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1), 316-349.
- Gilardi, F. (2016). Four ways we can improve policy diffusion research. *State Politics & Policy Quarterly*, 16(1), 8-21.
- Glick, D. M., & Friedland, Z. (2014). How often do states study each other? Evidence of policy knowledge diffusion.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42(6), 956-985.
- Howlett, M., McConnell, A., & Perl, A. (2017). *Studying public policy: Policy cycles and policy subsyste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B. D., & Baumgartner, F. R. (2012). From there to here: Punctuated equilibrium to the general punctuation thesis to a theory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olicy Studies Journal*, 40(1), 1-20.
- Lee, T., & van de Meene, S. (2012). Who teaches and who learns? Policy learning through the C40 cities climate network. *Policy Sciences*, 45(3), 199-220.
- Luxon, E. M. (2017). What do advocates know about policymaking? Revealing process in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6(1), 106-125.
- Mallinson, D. J. (2021). Growth and gaps: A meta-review of policy diffusion studies in the American states. *Policy & Politics*, 49(3), 369-389.
- Mossberger, K. (2000). *The politics of ideas and the spread of enterprise zones*.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Neij, L., & Heiskanen, E. (2021). Municipal climate mitigation policy

- and policy learning - A review.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317), 128348. <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21.128348>
- Nowlin, M. C. (2021). Policy learning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olicy Studies Journal*, 49(4), 1019-1039.
- Radaelli, C. (2004). *Who learns what? Policy learning and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The ESRC Seminar Series: 'Implementing the Lisbon Strategy, Policy Learning Inside and Outside the Open Method', November 26,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https://ore.exeter.ac.uk/repository/bitstream/handle/10036/23652/RadaelliPolicyLearning.pdf?Sequence=1&isAllowed=y>
- Rogers, E. M. (1995).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Free Press.
- Rose, R. (1993). *Lesson-Drawing in public policy*. Chatham House.
- Rose, R. (2005). *Learning from comparative public policy: A practical guide*. Routledge.
- Sabatier, P. A., & Weible, C. M. (2007).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Innovations and clarifications. In P. A. Sabatier (Ed.),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pp. 189-220). Westview Press.
- Shipan, C. R., & Volden, C. (2008). The mechanisms of policy diffu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4), 840-857.
- Shipan, C. R., & Volden, C. (2012). Policy diffusion: Seven lessons for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2(6), 788-796.
- Simon, H. A. (1997).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The Free Press.
- Stone, D. (1999). Learning lessons and transferring policy across time,

- space and disciplines. *Politics*, 19(1), 51-59.
- Stone, D., Porto de Oliveira, O., & Pal, L. A. (2020). Transnational policy transfer: The circulation of ideas, power and development models. *Policy and Society*, 39(1), 1-18.
- Volden, C. (2006). States as policy laboratories: Emulating success in the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2), 294-312.
- Weible, C. M., Olofsson, K. L., & Heikkila, T. (2023). Advocacy coalitions, beliefs, and learning: An analysis of stability, change, and reinforcement. *Policy Studies Journal*, 51(1), 209-229.
- Weyland, K. (2006).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policy diffusion social sector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T. D. (1997). Information behavior: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33(4), 551-572.
- Zahariadis, N. (2003). *Ambiguity and choice in public policy: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in modern democracies*.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附錄

表 A

各領域學習對象國家的前 20 名及其被學習次數

內政		經濟		教育		交通		法務		農業		衛福		環保		勞動		文化		財政	
國名	次數	國名	次數																		
美國	124	日本	401	中國大陸	100	日本	364	美國	102	日本	329	美國	316	美國	162	美國	117	中國大陸	116	韓國	43
日本	110	美國	306	日本	78	美國	298	日本	49	美國	179	日本	202	日本	104	日本	74	日本	48	馬來西亞	25
新加坡	39	中國大陸	221	美國	55	中國大陸	196	中國大陸	45	中國大陸	155	中國大陸	128	中國大陸	79	韓國	45	法國	39	美國	19
中國大陸	32	德國	129	韓國	48	新加坡	186	德國	41	泰國	104	韓國	82	韓國	61	德國	35	美國	25	越南	19
韓國	30	韓國	119	馬來西亞	33	德國	87	英國	34	韓國	80	英國	72	德國	39	英國	26	韓國	23	印尼	17
英國	27	瑞士	112	印尼	31	韓國	83	韓國	18	越南	62	新加坡	61	新加坡	29	新加坡	24	英國	22	比利時	17
德國	25	英國	96	德國	30	英國	82	澳大利亞	16	澳大利亞	61	馬來西亞	60	英國	29	歐盟	21	德國	18	瑞士	16
法國	24	法國	93	新加坡	27	澳大利亞	50	加拿大	14	菲律賓	56	泰國	51	加拿大	25	澳大利亞	19	新加坡	15	法國	16
澳大利亞	17	新加坡	88	英國	27	荷蘭	50	歐盟	14	法國	53	澳大利亞	47	歐盟	25	法國	16	馬來西亞	13	中國大陸	15
加拿大	16	泰國	72	越南	25	法國	49	法國	13	馬來西亞	44	瑞士	45	泰國	25	義大利	11	泰國	10	菲律賓	15
荷蘭	12	澳大利亞	71	泰國	21	加拿大	46	荷蘭	13	德國	43	法國	44	馬來西亞	24	中國大陸	10	荷蘭	8	日本	14
越南	12	越南	69	澳大利亞	21	馬來西亞	44	新加坡	12	印度	43	德國	40	荷蘭	21	荷蘭	10	義大利	8	新加坡	14
馬來西亞	10	馬來西亞	55	奧地利	18	泰國	30	比利時	11	英國	42	加拿大	40	瑞士	21	瑞典	10	澳大利亞	7	澳大利亞	11
泰國	10	菲律賓	52	法國	17	菲律賓	30	馬來西亞	9	荷蘭	40	越南	31	比利時	19	越南	9	加拿大	6	荷蘭	10
歐盟	10	荷蘭	52	菲律賓	13	阿拉伯	27	義大利	9	印尼	40	奧地利	28	法國	17	加拿大	9	瑞典	5	德國	9
印尼	9	印尼	48	比利時	12	印尼	26	蒙古	9	加拿大	29	印尼	23	菲律賓	17	泰國	8	紐西蘭	5	泰國	8
瑞士	9	歐盟	44	以色列	11	瑞士	22	印尼	7	瑞士	25	比利時	22	越南	17	菲律賓	8	西班牙	5	俄羅斯	7
奧地利	6	印度	34	加拿大	9	瑞典	22	越南	6	歐盟	17	歐盟	20	印尼	15	比利時	8	墨西哥	5	秘魯	7
菲律賓	5	加拿大	32	瑞士	9	歐盟	22	泰國	5	丹麥	16	義大利	20	義大利	15	印尼	7	比利時	4	智利	7
瑞典	5	比利時	32	瑞典	9	印度	21	瑞士	5	新加坡	15	西班牙	19	澳大利亞	14	紐西蘭	6	越南	3	英國	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A Study on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Policy Learning Objects in Taiwan

Chung-Pin Lee *

Utilizing learning from others as a prototype for policy solutions to reduce the risk of policy experimentation and address unprecedented issues has become a standard tool in public governance. However, for policy learning to succeed, it is crucial to obtain useful "lesson" information that enhances policy quality. Unfortunately,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policy learning has not systematically addressed a fundamental epistemological question: Where do the sources of lessons originate (from countries providing helpful information or from friendly, neighboring, or linguistically similar countries)? Do different policy areas follow the same selection mechanism? These questions have yet to be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This study conducts a textual analysis of written materials from the Executive Yuan of Taiwan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ources for the government's policy learning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nd to answer the abovementioned question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for Taiwan's international policy learning targets predominantly follows an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operating according to established organizational procedures and public servants' cognitive limitations and habits. This means that the selection often follows pre-existing networks established for other needs (such as political diplomacy, trade, etc.) or opts for region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where information is easily accessible (such as those that are easily reached or share the same language). This trend is consistent across various policy domains.

Although this study cannot determine whether the quality of current policy learning information is "good" or "bad" or whether it is sufficiently diverse, it is advisable to institutionalize the evaluation work of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integrate it into policy learning practices. In terms of research,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hanges in the information networks that the government relies on for policy learning over time be monitored and the impact of geographical factors considered.

Keywords: policy learning, lesson-drawing, information network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behavior

